



青莲庵桥

青莲庵桥，清代古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该桥位于江夏区郑店街青年庵四组西北部约150米处的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港上，是江夏区唯一一座体型较大、保存较好的双孔平梁桥。青莲庵桥主要用花岗麻石砌建，间有少许红砂石。桥面全长17.2米，残宽1.75米，单孔间距2.8米，总跨度8.7米。桥面内顶距水面高1.8米，两端桥基呈八字形，中间桥墩东西两端呈三角形，墩长6.15米，宽1.75米。桥面现存十块长条石，石长3.95米~4.07米，宽0.35米，厚0.3米。除桥面两侧缺少四块条石外，整体保存较好。两侧原建有护栏，毁于20世纪50年代。

（文 / 祁金刚、刘桂英 图 / 王运良）

目录

编委会名誉主任：谭仁杰 彭富春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心耀 方方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陆永初 涂文学 萧志华
彭小华 董宏猷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编委会副主任：陈光 朱向梅
杨华 李修文
陈国方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尹鹏 甘琼 龙桃仙 吕照清
刘重武 邹仕芳 汪利珍 张霞
陈俊 姚四平 曾艳红 窠梅
潘红莲

主编：陈国方

副主编：周敏

责任编辑：周敏 游迎

编辑：华蕾 张川蕾

封面设计：王鹏

武汉70年

<<< <

- 4 长风破浪会有时
——“工业强市”与新世纪武汉城市地位的提升
/涂文学

山有黄门

<<< <

- 12 履齿印痕诉当年
——武汉大学新闻教育发展点滴回顾/樊凡
- 17 回顾1958年“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往事
/黄载禄

委员天地

<<< <

- 23 从小山村走向大武汉/李敏娟
- 28 我的人生进化论/张珺

武汉文史资料

WUHAN CULTURAL & HISTORICAL DATA

C O N T E N T S

2019年第7期（总第321期）

往事漫忆



- 34 我的父亲李蕤与《长江文艺》/宋致新
41 一个武汉人在巴格达的工作经历/张智海

人物春秋



- 49 我的民国故事——刘绪贻回忆录（十七）
/刘绪贻（口述）余坦坦（整理）

史海钩沉



- 52 汉口民革组织的建立及其地下活动略记/张梦圆
57 鄂东名医刘楚樵/王腊波

楚风汉韵



- 60 沈云陔先生艺术传承往事/易俗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达印刷厂

出版日期：每月28日

定 价：8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246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82220667

（027）82220669（传真）

E-mail: whzxwzsl@163.com

长风破浪会有时

——“工业强市”与新世纪武汉城市地位的提升

◇ 涂文学

如果说，武汉城市圈建设及其“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是通过走新型城市化道路提升武汉城市的整体竞争力，那么，“工业强市”战略的提出及其实施则是通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进一步优化城市功能，提高城市综合实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武汉跨越式发展。

现代工业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武汉的发展与落伍都与工业化发展密切相关。进入新世纪，武汉的决策者面对武汉地位失落的窘态，认识到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及时调整城市发展战略思路，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突出“工业强市”，带动三次产业协调发展，使城市经济实力得到整体提升，城市功能进一步优化和完善。

梳理一下这一阶段武汉决策层关于武汉发展的报告、讲话和规划，我们不难发现“工业强市”，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已然成为武汉改革和发展的主旋律。

——2002年1月，武汉市第十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牢牢把握加快发展的主题，充分发挥武汉作为中国中部特大城市所拥有的区位优势，作为我国重要科教基地所聚集的人才智力优势，作为我国重要工业基地所建立的制造业的物质技术优势，作为区域中心城市所形成的综合服务功能优势，展我之长，避己之短，不断开拓，不断创新，着力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报告强调指出，“城市综合竞争力，集中体现为城市具有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而产生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必须

把加快建设“五大产业基地”、五个功能中心作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培植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中之重，努力构筑起以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和高层次服务业为核心支撑，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产业体系。”

——2003年1月，武汉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振兴制造业。制造业是强市之基、富民之源。要加快建设光电子、钢铁及新材料、汽车及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环保等‘五大产业基地’，积极发展服装纺织、食品、造纸及包装印刷等三大优势行业，建成我国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加快开放引进，争取国家支持，着力实施一批投资规模大、产业带动性强的大项目。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改造传统产业步伐，推动传统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升级。聚集资源、资本，培育名牌产品和知名企业。促进各类企业间的合作、配套，延伸产业链，形成产业群。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建设‘数字武汉’，提高城市信息化水平。”从此以后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词。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继续强调以突出抓好工业促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以新型工业化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老工业基地改造振兴，促进武汉跨越式发展的同时，首次提出“项目兴市”：“坚持‘项目兴市’，提升城市功能。项目决定城市的综合实力和后劲。必须牢固树立项目意识，把项目工作作为加快城市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举全市之力切实予以推进。围绕打造武汉现代制造业基地，加快推进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抓紧实施武钢二冷轧、东风本田汽车、神龙汽车二期、中誉汽车、精伦电子、凯迪环保、阳逻电厂三期、亚东水泥、大学科技园、曙

光软件园、IT产品基地等项目建设，加快推进武烟、晨鸣等技改工程，积极做好乙烯和武烟集团搬迁改造等项目前期工作，进一步做强做大主导产业。”

——2006年，《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总体规划纲要》第一次将“工业强市”作为城市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十一五’时期，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紧紧抓住国家实施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历史性机遇，深入实施‘工业强市’、科教兴市、开放先导战略，加快推进体制创新、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环境改善和城市功能提升，着力提升城市竞争力，增强城市亲和力，塑造城市个性魅力，提高城市综合实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努力实现武汉发展的新跨越。”总体规划提出，要在“十一五”时期把武汉建成全国重要的科技教育基地，交通通信枢纽，中部地区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中心，具有滨江滨湖特色的现代化城市，真正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为此，总体规划提出了“四两”发展举措，即坚持“两业并举”（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提升工业化水平；增强“两通”（交通、流通）优势，夯实现代化基础；开拓“两个市场”（国际、国内），提升市场化和国际化水平；实施“两大计划”（社区建设883行动计划、农村家园建设行动计划），推进和谐武汉建设。

——2006年12月，武汉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思路：以新型工业化推进产业创新，带动和推动现代服务业和都市农业发展，促进经济

结构优化升级。“必须把科学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高技术产业带动先进制造业大发展，以先进制造业带动现代服务业和都市农业大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增长方式转变。”“武汉是老工业基地，改造振兴的任务艰巨。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紧紧依靠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加快产业结构调整，通过‘武汉创造’做大做强‘武汉制造’，逐步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产业发展新格局。”武汉新型工业化道路怎么走？报告提出了四条举措，一是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产业创新的主攻方向，按照产业化、集聚化、规模化的要求，发展壮大一批特色产业基地，实现优势高技术产业集群发展。二是把制造业高新技术化作为产业创新的重要途径，加快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提升汽车、船舶、发电设备、机床等装备制造业，提高重大成套装备技术整体水平和产品附加值，建设我国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支持武钢实施规模扩张和产品升级换代，建设全球最大的冷轧硅钢片生产基地和全国主要的汽车板生产基地。推进武石化油品质量升级炼油改造和 80 万吨乙烯项目，建设中部地区石油化工生产基地和产品供应中心。加快烟草及食品、环保、家电、纺织服装、造纸及包装印刷、桥梁建筑等优势产业的改造步伐，形成产业竞争新优势。三是把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产业创新的战略任务，调整优化服务业结构，在推动商贸、房地产等服务业发展的同时，突出发展现代物流、金融、旅游、会展及商务服务、信息服务及软件业、创意产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和知识性服务业。四是把发展区域经济作为产业创新的重要支撑，充分发挥各区的资源优

势，突出各自特色，实行错位发展，形成有序竞争、合作共赢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2011 年 3 月，《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工业强市”战略和“工业倍增”计划：“十二五”时期，武汉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中心、现代服务业中心和综合性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基地，加快建设全国“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巩固提升中部地区中心城市地位和作用，努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全面完成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任务，为把武汉建成现代化国际性城市奠定坚实基础。在提升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深入实施“工业强市”战略和“工业倍增”计划，以千亿产业和百亿企业为重点，加快技术改造步伐，促进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结合，做大做强支柱产业，发展优势产业，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中心。通过重点实施“千亿产业百亿企业”工程、新兴产业培育工程、“千亿投资百亿项目”工程、“千亿板块百亿园区”工程、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壮大工程、绿色制造工程等六大工程，到 2015 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15000 亿元，力争突破 16000 亿元；工业增加值达到 4200 亿元，力争达到 4500 亿元。武汉市市长阮成发在向市委十一届十次全委会议作《中共武汉市委关于制定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说明时，从工业化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决定因素的高度指出推行“工业强市”战略和“工业倍增”计划的必要性：当前，发展不够仍然是武汉最大的实际和面临的主要矛盾。与同类城市相比，武汉市经济总量上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工业发展上。武汉

市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在这样一个阶段，工业是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是体现城市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决定因素。“十二五”时期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武汉市的工业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进一步提升发展规模、水平和竞争力的问题。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工业强市”战略，大力推进“工业倍增”计划，实现工业发展新的突破。阮成发进而提出从



武汉 80 万吨乙烯项目现场

三个方面推进“工业倍增”计划：一是通过优化结构，改善品质质量，增强配套能力，促进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钢铁、石化、食品加工等支柱产业升级改造、由大变强。二是通过再上一批大项目，强化多点支撑。一方面加快 80 万吨乙烯、东风本田、富士康武汉科技园、中芯国际武汉芯片等一批在建项目的建设进度，尽快投产达产；另一方面，开工建设神龙三厂、格力电器产业园等一批新的重大产业项目，特别是新引进一批投资过百亿的重大产业项目，增强发展后劲。三是通过壮大产业和企业规模，培育发展一批千亿元产业和百亿元企业，做大工业经济总量，实现主要工业经济指标翻番。

“工业强市”思路一旦明确，武汉全市上下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工业强市”“项目兴市”“工业倍增”成为新世纪武汉改革开放和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关键词、主旋律。

一是不断进行工业结构调整，着力推进现代制造业基地建设。2003 年至 2008 年，以光机电制造业为重点，按照“强化光电、

做大汽车、巩固钢铁、壮大医药、提升环保、发展食品、深化化工”的要求和“企业向园区集中、产业向规模和集群集中”的思路，完善产业体系，推进工业结构调整。以项目为依托，努力构筑五大产业板块，加快发展钢铁、汽车、光电子、石化、烟草及食品、生物医药、环保、纺织服装、造纸及包装印刷、家电等十大主导行业，延伸产业链，培育企业群，不断优化产业布局。2009 年至 2012 年，突破性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培育产业竞争优势。实施新兴产业培育工程，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发展。着力建设四大工业板块：依托“武汉·中国光谷”，联合洪山区、江夏区，建设 1000 平方千米的大光谷板块；依托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合蔡甸区、汉南区，建设中国车都；依托吴家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河国际机场，联合黄陂区、东西湖区，建设临空经济发展区；依托武汉新港、武汉化学工业区，联合青山区、新洲区，建设重化工基地。

二是立足“项目兴市”，积蓄发展后劲。注意把项目建设作为加快发展的重要支撑，围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外引内联，着力形成“在建一批、开工一批、储备一批”的项目滚动推进机制。积极支持对结构调整有重大促进作用的重点项目建设，“十一五”时期，共策划重大项目 1342 项、总投资超过 10000 亿元。武钢二硅钢、二冷轧、东风本田汽车等 114 个市级重点建设项目建成投产，富士康项目落户武汉，神龙汽车二厂、中芯国际武汉芯片项目开工建设，80 万吨乙烯项目取得重大进展。“十二五”开局的 2011 年，由于实施“千亿产业百亿企业”工程，富士康武汉科技园、神龙三厂、东风本田二厂等一批重大项目抓紧建设。全年工业完成投资 1202.14 亿元，增长 42%，增幅在全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中名列第一。

三是整合科技资源，加强自主创新，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科技引领和带动产业升级和企业发展。首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信息技术改造提升汽车、船舶、发电设备、机床等装备制造业，建设我国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锅炉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江动力公司（集团）等企业进行搬迁改造工程，船舶配套工业园、武钢高科技产业园、中冶南方机电产业园等项目顺利实施。2008 年，武重、武锅和中国长动组建成立武汉重工集团公司，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打造中国中部地区现代装备制造业“航母”，力争建成大型装备制造业集群。其次，追踪世界高科技产业发展趋势，通过自主创新和重大项目引进，打造特色支柱产业。充分利用“武汉·中国光谷”优势，将光电子信息产业作为新一轮大发展的主导产业强力推进。2006 年，“光谷”

对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楚天激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武汉光谷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三大公司重组，打造国内最大的激光集团；同年，成功引进中芯国际园区项目，次年又引进富士康武汉科技园项目，这两大项目的引进使“光谷”在集成电路产业和消费电子产业取得历史性突破，建立了中国最大的光纤光缆制造基地、中国光通信领域最强的科研开发基地。据 2009 年统计，“光谷”的光纤光缆生产规模居全球第二，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50%，国际市场占有率为 12%；光传输设备国内市场占有率 10%；光电器件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60%，国际市场占有率为 6%；激光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一直保持在 50% 左右。第三，推动科技园区发展，建设武汉科技新城。到 2008 年，“光谷”先后建立了关东科技工业园、关南科技工业园、武大华软软件园、华工科技园、海外学子创业园、南湖高科技农业园、光谷软件园、动漫产业园、佛祖岭产业园、富士康武汉科技园等一大批重要的科技工业园区。2008 年 11 月，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创新基地开工奠基，次年完成基建投资 36.6 亿元，招商引资洽谈项目 238 个，投资总额 300 亿元。在科技园区建设的基础上，武汉市积极谋划“武汉科技新城”规划与建设，2005 年，完成《武汉科技新城总体规划（2005~2020 年）》编制工作。科技新城规划范围总面积约 224 平方千米，其规划和建设理念是“全球同步，世界一流”，主要内涵是“一流的运转模式及效率、一流的科技水平、一流的人才和企业、一流的环境和设施”，以创新、服务为理念，构筑创新产业园地、科技服务平台。2005 年至 2008 年，武汉科技新城基础设施建设共投资 199 亿元，完成 100 多项重大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一个以高

新技术及相关产业为基础，以创新服务为特色，融研发、服务、生产、居住为一体的科技新城初具规模。第四，积极申报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力争在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方面有更大作为。2009年4月21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呈报《关于支持武汉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请示》；同年12月8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同意支持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批复》，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成为继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后，全国第二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0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批复同意成立由科技部等19个部级单位组成的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部际协调小组，协调解决示范区建设中的重大问题。2010年1月，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召开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动员大会，确定力争用10年左右的时间，将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建设成特色鲜明、实力雄厚、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科技发展试验区、先进产业聚集区、自主创新示范

区、改革开放先行区，使其成为国家重要的综合性高技术产业基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创新创业环境一流的现代新区，推动“两型社会”建设、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典范。会上出台了《关于加快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并成立由省长任组长的湖北省建设东湖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领导小组，加强对示范区建设的领导。2010年2月，中共武汉市委、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全力推进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决定》，要求深刻认识建设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重大意义，举全市之力建设示范区；抢抓机遇，先行先试，大胆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消除制约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破解共性难题，解决阻碍科技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突出矛盾。成立了由市长任组长的武汉市建设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领导小组。5月，市委、市政府决定将洪山区左岭镇、花山镇，江夏区流芳街、五里界街移交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托管，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总面积达到518.06平方千米。2011年5月底6月初，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视察湖北武汉时考察了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要求湖北省和武汉市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努力掌握更多自主知识产权，在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上有更大作为。2012年3月，国务院批复同意《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规划到



2010年1月，湖北省建设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动员大会暨全省推进自主创新大会在洪山礼堂举行

2015年，示范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基本形成，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开放合作形成新局面，园区发展环境明显改善，机制体制创新取得新突破；到2020年，实现企业收入3万亿元，在光电子、生物、地球空间信息及应用服务领域形成若干拥有技术主导权的特色产业群，成为创新要素聚集、创新能力较强、创新环境优良、创新经济活跃的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排头兵，世界一流的高科技产业园，享誉世界的“光谷”。《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业发展规划》提出，未来十年，示范区将全力打造以光电子信息为核心产业，以生物、环保节能、高端装备为战略产业，以高技术服务为先导产业的“131”产业结构，进入全球高新技术发展第一梯队，成为全球光电子产业中心、新兴产业发展试验区、低碳经济发展示范区和企业发展核心区，高新技术占示范区总收入80%以上，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集群。自2009年始，武汉市先行先试，勇于创新，在股权激励、科技金融、行政审批、财政税收等方面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加强自主创新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创新平台建设，大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加强孵化器（加速器）建设，大力实施人才战略计划，使示范区成为高新技术人才创新创业的乐土。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加强重点产业发展，力促产业集群形成。用国际标准指导示范区建设，确立发展高科技、实行产业化的方针，把高科技产业集群、千亿产业集群和超百亿企业的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来抓，做大做强示范区。到2013年年底，光电子信息产业实现总收入2500亿元，为2009年的340.41%；生物产业实现总收入500亿元，为2009年的248.13%；环保节能产业实现总收入770亿元，为2009年的221.58%；

高端装备制造业实现总收入750亿元，为2009年的214.29%。示范区总收入过百亿元的企业8家，过亿元企业331家，年纳税过亿元的企业14家。国家级产业基地建设如火如荼，到2013年已达17家：武汉国家激光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武汉国家现代服务业数字内容产业化基地、武汉东湖国家级文化与科技融合示范基地、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电子信息（光电子）产业基地、武汉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武汉综合性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承载区、武汉国家现代服务业地球空间信息化产业基地、武汉国家信息产业高技术产业基地、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示范区、国家火炬计划武汉汽车电子产业基地、武汉国家光电子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湖北软件产业基地、武汉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武汉国家现代服务业信息安全产业化基地、国家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示范区等。科技引领促发展，先行先试结硕果，2009年，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总收入为2216亿元，2013年达到6517亿元，增长1.94倍；2009年工业总产值1975亿元，2013年达到5086亿元，增长1.58倍；2009年全口径财政收入71.66亿元，2013年达到237.56亿元，增长2.32倍。

四是补齐武汉工业化短板，大力推进远城区新型工业化。2011年1月28日发布的《中共武汉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工业发展倍增计划，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大力推进远城区新型工业化，每个远城区集中力量抓好一个新型工业化示范园区建设，力争远城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同年4月26日，市政府召开全

市远城区新型工业化工作会，部署远城区工业化工作，把推进远城区工业化发展作为治庸问责的示范工程。5月30日，市政府召开全市远城区新型工业化招商和项目调度第一次工作会议。会议要求进一步推进远城区工业化规划和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招商引资全员上阵，优化工业项目落地管理，尽快出台招商引资的政策体系。为了解决工业用地不足的问题，2011年7月，武汉市出台《远城区示范工业园区规划意见》，明确建设分布全市“6+3”区域内的9大新型工业化示范园区，东西湖区示范工业园区按30平方千米以上规划，蔡甸、江夏、汉南、黄陂、新洲区示范工业园区按20平方千米以上规划，洪山、汉阳、青山区示范工业园区按10平方千米以上规划。新的示范园不是“摊大饼”，而是为新型工业化产业政策实施导向，将过去分散摆布的项目归拢，设立新标，强调土地集约、产业集聚、节能环保，以大项目催生大产业、带动大配套、形成大集聚，壮大支柱产业，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限制高耗能产业，淘汰落后产业。规定每平方千米投资强度不得低于25亿元，产出不得低于40亿元，重点扶持机械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钢铁及深加工、食品烟草等支柱产业和新能源、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到2015年形成5个1000亿元、4个500亿元园区。自2011年3月起，武汉市首次把工业投资占比、工业增加值占比、工业投资项目数量、工业投资增幅、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等指标，与各区绩效目标挂钩，武汉“6+3”区域即蔡甸、江夏、汉南、新洲、黄陂、东西湖、汉阳、青山、洪山等九个区，与市政府签订工业“军令状”，从区委书记到街镇干部，全员上阵招商引资，抓工业项目落地，一批大项目

纷纷落户。总投资30亿元、产业总收入近100亿元的中国航空工业武汉产业园落户黄陂临空经济区，兵装集团投资44亿元的单晶硅电池项目落户黄陂，中建集团投资10亿元幕墙项目花落蔡甸，青山区成功引入投资20.9亿元的100万吨煤焦油加工项目……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乘着国家快速发展现代化、工业化的东风，武汉顺势而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城市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功能结构更趋完善。三次产业结构由“十五”末的4.8：45.4：49.8调整到“十一五”末的3.1：45.9：51。2005年，工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2.6%，2010年为35.2%，2011年以后更有长足进步，连续3年超过40%。武汉在全国同类型城市的排位也得到较大提升，由2003的第15位提高至2013年的第10位。武汉，迈着矫健的步伐，一步步走出“不东不西，不是东西”的边缘化困局，重振雄风，全面开启了复兴大武汉的伟大征程。

履齿印痕诉当年

——武汉大学新闻教育发展点滴回顾

◇ 樊 凡

对于武汉大学的新闻教育，人们通常都把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前身——新闻系1983年成立作为起点。而实际上，如果要细说从前，全面总结我校新闻教育的经验教训，则应把时间前移7年，从1976年中文系新闻专业成立算起。因为，如果说新闻系的工作为新闻学院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么，此前中文系新闻专业的摸索，则从另外的角度丰富了我们教育改革、对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科建设的认识。所以，客观地说，我校的新闻教育从中文系办新闻专业时就开始了。

新闻专业在期望中诞生，又在摇篮中夭折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话是前人评说历史上王朝兴衰时说的。可我每

想到当年的新闻专业，这句话就不由自主地浮上心头，因为拿它来描述新闻专业，还真有几分近似。

那是1976年6月，我刚从沙洋分校回到总校中文系，系教改小分队队长李希贤教授找到我，说：“我们从教改的角度出发，打算办一个新闻专业，你是系里唯一搞过新闻的老师，希望你来负这个责。”“文革”初期，我受李达校长“三家村”冤案的牵连，被打成“黑帮分子”，“先定性，后找材料”，被押送乡下劳动，之后又被送到沙洋分校去搞“斗批改”，被“挂”了整整10年。基于对工作的渴望，我二话不说，爽快地答应了。

按规矩，要办一个新专业，得先给教育部打一个报告，待上面批复同意了，方能动手。但那时，许多规章程序都被“砸烂”，这正好帮助我们提高了“效率”。说干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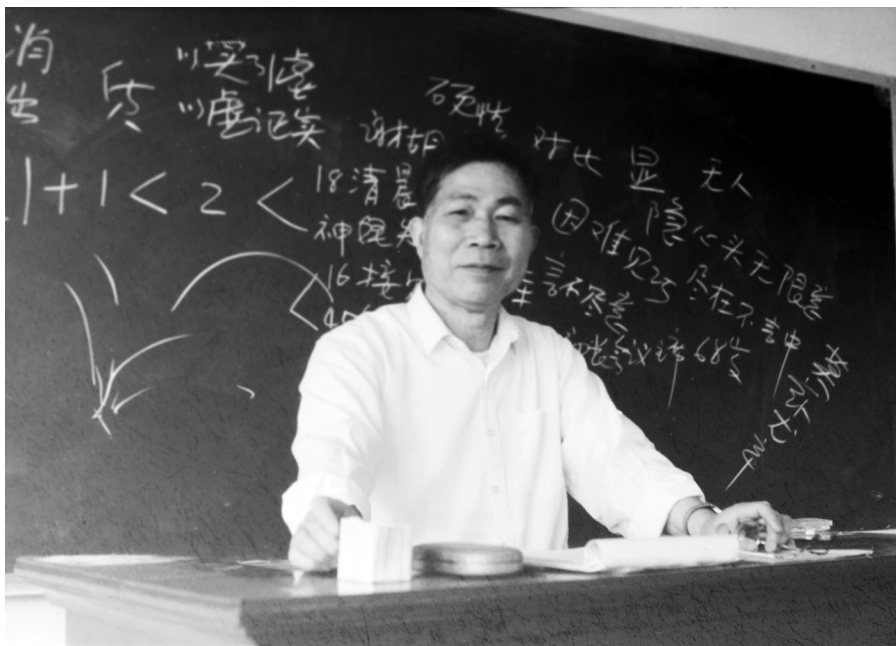
干，我们不仅“自主”成立了新闻专业，还把1975级工农兵学员三个班中的两个班（二班和三班，共49人）调过来，作为新闻专业的学员来进行教育；老师也一口气凑了10多个，可谓雷厉风行、立竿见影。

为了独立地开展工作，系里要我们师生共同组成一个领导班子。这个班子当然必须贯彻工农兵学员“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原则。首先是成立党支部，由二班班长、海军学员朱万昌任支部书记，三班班长、陆军学员张茂盛任副书记，同为陆军学员的王玉恩任宣传委员，知青出身的农民学员叶荣华任组织委员，李希贤作为老师委员参加支委会，徐正榜则任教师党小组组长。至于我这个业务上的负责人，则什么名义也没有。聪明的朱万昌不知是说给我还是其他人听，大声说：“樊老师，你是老兵，党龄比我们年龄都大，我们都听你的。”我当过兵，入党早的特殊经历和对工作尽责的态度使我与学员相处得十分融洽，于是我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先是向学员讲授新闻在社会生活、社会发展和人际交往中的作用，帮助学员建立初步的专业思想；接着讲授新闻采访和调查研究的相关知识，以帮助他们利用即将到来的暑假到各基层广播站去实习，初步接触新闻工作。

然而，这还只是“热身”活动，要进行正规的新闻教育，还必须借鉴先行者的经验，跟着他们的路子走。于是，秋季开学之后，系副主任张广鸣带着我和另外两名青年教师到复旦大学新闻系取经，还到杭州观察他们学生的实习。回来之后，我就照葫芦画瓢，制订了三年的全程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当时最伤脑筋的是没有教材。大学“复课闹革命”虽已几年，书店里却没有一本新闻学教材出售。费了好大的劲，才从北京大

学买来一本《新闻理论讲话》，从复旦大学买来一本《新闻写作》。《新闻理论讲话》是一本只有几万字的小册子，署名为“北京朝阳区工农通讯员和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1973级工农兵学员编”，内容先是断章取义地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有关新闻工作的论述和他们的办报活动，接着讲述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之后按照“无产阶级报纸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的思想，阐述报纸的性质、任务、作用和办报原则，全书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和“批林批孔”，而不是构建新闻学科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新闻写作》为复旦大学新闻系老师和1975级工农兵学员所编，里面虽也介绍了消息、通讯、小故事和广播稿等常用文体的写作，但都很简单，不到全书的八分之一，目的也不是告知写作规律。其余大量的篇幅，则是推荐范文。用这样的教材，很难帮助学生建立新闻记者应有的知识结构。好在我以前在报社工作时，曾利用两年的业余时间，有组织地集体自学了《联共（布）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这套上百万字的两卷本精装讲义，虽不是字字有用，却开阔了我的眼界。我就把它们糅合在一起，对学员进行讲授，多少弥补了一点现行教材的不足。

当时，“左”的风气尚笼罩学坛，否认教学规律，否认“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操作），而用短视的、实用主义的“典型产品学科”“任务带学科”来取代。对此我们不是毫不怀疑，但在当时的氛围下，却不敢去多想，而是跟着潮流走。在“任务带学科”的思想指导下，我们无法对学员进行系统的理论教学，也没有进行严格的操作训练，只作简单的知识介绍，就把他



20世纪90年代，樊凡教授课间留影

们带到工厂、农村去“开门办学”，企图通过采写的“任务”，把“学科”的知识传授以及“学科建设”“带”起来。为此，我们曾于1976年11月和1977年5月，采取了两次整体下乡下厂的大行动。头一次，我与一批学员到了湖南长岭炼油厂，进行调查报告和工作总结的采写。这是个有6000多工人的大厂，设备先进，效益很好，要求我们通过调查研究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搞了一个多月，同学们没有拿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最后只好由老师操刀。第二次，我把三班全班再加上二班一个组33人整个带到了鄂西，分组深入到神农架原始森林、郧县绿松石矿、竹山白玉垭高山林场和丹江口水电站等地进行采写。这些地方虽也受到错误路线的干扰，但好人好事不少，是出新闻的地方。我在深山密林、矿井工地之间来回奔跑，进行指导。

1976年秋，新闻专业又招了一个班。学员知识水平虽参差不齐，有高中、有初中，还有只读过小学的，但都品行端正，生活朴

素，学习勤奋，爱好写作，有的文笔还相当漂亮，是新闻记者的好“胚子”。面对他们求知若渴的目光，我越来越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检讨1975级两次“开门办学”的经验教训，我对“左”的教学思想的认识由朦胧转向清晰，意识到“任务带学科”“带”不动，必须从提高师资队伍水平入手，正面加强学科的建设，

用学科建设去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于是，我向系里建议，派人到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去进修（第一批派了两人），让没搞过新闻的老师到传媒挂职（分批去了），要求青年教师多听老教师的课，增加经验，加强集体备课，弥补个人的不足，还请了一批老记者编辑来兼课，以利于学员及时了解专业前沿的动态与知识。

但好事多磨，正当我们奋发进取，努力工作，以期取得更好的成绩时，1977年底、1978年初，新闻专业却被宣布下马了。

历史淡去了，脚印却永远清晰

改革、发展，不能有路径依赖。“一个单位，越有光荣的历史、光辉的名声，其理念、作风和制度越易形成路径依赖，变革的难度也越大。”这是《光明日报》上一篇文章的论断。这篇文章讲的是军事变革，我这里移植过来，是试图解释新闻专业下马的原因与教训。

新闻专业的宣布下马，事先没有与我们这些当事人打招呼，更没有征求我们意见，事后也没有人出来解释。找最初当面授命的李希贤，他也茫然。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还没有实行改革开放，领导说一不二，我没敢去问，更不敢去争“生存权”，只是十分痛惜。

现在冷静地回顾历史，设身处地为当时的决策人想一想，似乎也不无道理：“文革”之前，武大中文系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五老”“八中”、一大批青年骨干，梯队完整，人才济济。国学大师章（太炎）黄（侃）学派的嫡传弟子在这里，全校五个一级教授，两个在这里。文学、音韵、文论、训诂、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一系列的领域，在国内都处于领军地位。只要沿着固有的道路走，就会自然地到达光辉的顶点。后来在政治运动中虽遭受重创，但力量犹在，鼎盛时期形成的价值观念、思想作风和路径依赖仍在左右着人们的头脑，形成一种历史惯性与历史堕力，不知不觉地牵引着人们，作为行动的信条。所以，打倒“四人帮”以后，在拨乱反正、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的当儿，对新成立的新闻专业作出“下马”的决定，集中力量办好基础雄厚、在国内很有影响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十分自然的事。

但事情也还有另外一面，如果当时看得远一点，改革决心大一点，能从国家对新闻人才和传播事业发展的需求来考虑，不是把条件还有所欠缺就办起来的新闻专业看成是“乱象”，在拨乱反正中将“脏水同小孩一起泼掉”，而是看成是只“丑小鸭”，像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在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描述，一位年轻的母亲对怀中的婴儿喃喃自语：“你多丑，多丑，

但我多爱你！”如果加以爱护与培育，可能又是另一番景象。因为，从写作专业技能的角度看，语文是新闻的母体，古今中外最初进入新闻领域的人，没有一个是先学好新闻才去搞新闻，而是凭借深厚的文、史、哲功底去开拓新闻。语文的表现手法，除了想象与虚构之外，新闻都可以借鉴，所以，语文是新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营养之源。语文一塌糊涂的人，新闻是搞不好的。因此，国内许多新成立的新闻专业，多是由中文专业孵化的。

我校当年成立新闻专业，本是顺应潮流的改革之举，却又浅尝辄止，退了回去，真是可惜。否则，我们在新闻教育上就多赢得了五年宝贵时间，前面的探索必会成为后面的镜子，工作会越来越越好。更重要的是，一支十多人的教师队伍不致走散，后来成立新闻系时又从零开始到处寻人重组班子。这支队伍尽管当时不成熟，但潜质都不错，留校的四人，三人成了教授（两人当了系主任，一人为研究所所长），一人成了学校中层领导骨干。离校的人则各奔东西，只知道一位叫罗高林的成了《长江日报》的高级编辑，他花了五年时间在小儿的写字凳上写就的长诗《邓小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翟泰丰为之作序，称“这部长诗结构宏大，语言鲜明，基调高昂，注意运用形象思维……在思想表达和艺术创造上都是成功的。”至于学员，因为不是作为新闻专业毕业，而我后来又到了新闻系，很少互通音讯。

有一次我到河南出差，意外地碰上当年的陆军学员李新全。他刚从外地出差回来，听说我在郑州，就从机场直奔宾馆来看我，还提了一大堆东西。他的热情使我感到负疚，“当年没教你们什么管用的知识。”

他说：“不，正是因为听了您和其他老师的课，使我知道了什么是新闻，怎样去抓新闻。我转业以后，在省委宣传部当上了新闻处处长和网络处处长，之后又当上了省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如今指挥着几百人的队伍，虽然不敢说工作做好了，但至少没人说我不行。今天我是特意来感谢老师的。”他又说，当年的宣传委员王玉恩，回到十七军，部队原本没有新闻干事这个岗位，却特意为他设了新闻干事，他在这个岗位工作得非常出色，得了不少表扬。后来转业到南阳市信访局当党委书记，由于搞新闻重视事实的天性，他的信访工作也搞得很好。他还告诉我，当年的二班班长、支部书记、海军学员朱万昌回到北海舰队，当上了某舰正师级政委；三班班长、陆军学员、支部副书记张茂盛转业后也在郑州，现在是河南机电职业学院的党委书记。

他的介绍让我高兴，也加深了我的惋惜：新闻专业从老师到学员，可塑性都是很大的，要是当年在发展、改革的历史关头没有因为路径依赖而轻率下马，一口气办下来该多好。

“学术不可趋时或挟势力以行”，这句话是我的老师、章黄学派传人黄焯教授对我的教导。他在仙逝前一年，惠赠了我一幅墨宝，从头到尾都是教导我如何做人和做学问。这是墨宝的最后一句，同样蕴含着两方面的叮嘱。据参与编辑《武汉大学学人墨迹选》的陈世饶教授说，在他见过的几百幅存稿中，这是思想文化含量最高的墨宝之一。可惜我秉性愚顽，当时领会并不深。多年后仔细回味，才知道老师教导的深刻。他对我的一番点拨，明显是针对现实，为时而发。要不是“四人帮”“挟势力以行”，强行推行违反教学和科学规律的教育路线，要不是

我自己懵懂“趋时”，随风摆柳，盲目相信“任务带学科”的神效，在制订三年全程教学规划时，新闻业务课只占44天（占5%），而“开门办学”却占444天（占55%），使学员无法得到系统的理论熏陶和严格的技法训练，在专业活动上无法进入自为状态，除了悟性高的，大多数成了“半吊子”，无形中增加了决策者的“下马”决心。

历史是一位好教员。中文系新闻专业的摸索，丰富了我们对于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科建设的认识。当我重新受命主持新闻系的教政时，痛定思痛，不仅强调打好基础，强调严格的技能训练，还冲破兄弟院校“就新闻论新闻”的框框，主张多学科融合交叉，跨专业、跨学科、跨文化丰富发展新闻学。教育部有关领导半年内四次找我谈话，谈的是同一话题：“你办的是不是新闻系？”我耐心解释，并继续坚持。最后得到了新闻单位和兄弟院校的赞许，教育部也不再存疑，并当面对我说把我们当作“老三”来培养（老大、老二分别指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新闻系）。学校提出“三创”教育以后，我们重基础、重学养、重实践的思路也更加明确了。

我非常感谢我们的学生，他们用汗水和创造性劳动阐释、发展和丰富着我们的教学理念和教学实践。后来，我由南到北走访了上百位毕业生，得知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都为母校增添了荣誉。当然，这不是说我们的工作已毫无缺陷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樊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退休教授，2017年2月去世）

回顾 1958 年“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往事

◇ 黄载禄

(一)

1957 年，我考入华中工学院无线电技术专业。当时无线电技术、自动控制专业都归属电机系。入校后正是“反右”时期，但这对大学一年级学生的影响较小。因而，大一的课程，如：数学、物理、电工基础及机械制图等，学得还不错。但到了大学二年级，情况就变了。1958 年 9 月，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以后我们的教学秩序乱了，上面常要求学校停课去参加劳动，如：参加修筑东西湖农场的大堤、修汉丹（武汉—丹江口）铁路等。一停课就是 3~4 周，而且学生要种菜，学校给各小班分发了锄头、铁锹、铁铲和木桶等工具。

当时学校的荒地很多，学生在晚饭后开荒种菜，我们将收获的菜交给食堂，将收的红薯上交一半，留下了约 200 斤藏在了学生宿舍的床底下。

大一我是学习委员，大二我是班长，参加这些活动要比一般同学占去更多的学习时间。因为没有时间做作业，课后没时间复习，前面不掌握，后面的内容有的就听不懂了。我从进初中以来就一直特别重视学习，上课、做作业都特别认真，遇到课堂上有听不懂的，下一次上课前必须彻底搞懂。现在有些课程问题一大堆，内心着急死了！但是我毫无办法，学生干部会议多，上面下来的任务一个接一个，接着又要求各学生小班都要办工厂。

无线电技术专业有两个小班（37 班和 38 班），我们班（38 班）32 个同学，办了个铁氧体磁性器件厂，生产广播喇叭的磁



1960年元旦，华中工学院电机系三年级“三丰收”（思想、读书、劳动）积极分子合影。前排左三为黄载禄

体，兄弟班办了个生产农村广播的送话器厂。由于已学了机械制图、电工基础等课程，办铁氧体厂所需的球磨机、充磁机等学生都可以自己设计，没有把握的再请教老师。全班同学分成了好几个小组，如：技术组、设备组、基建组、后勤组等，方案全班讨论，任务分头筹备，所需资金向学校申报。

当时处在热火朝天的办厂大潮中，只要合理，学校一般都会支持，因为这些设备所需资金对学校而言是小钱。由于后勤工作重要，就由班团支部书记黄道开负责。所需材料、设备加工，都是他与学校打交道，申请、报批、联系加工或购买等。黄道开有很好的对外交往的才能，只要他出马，很少有办不成的事。我在这方面远不如他。

办铁氧体磁性器件厂的设备大部分都交校附属工厂加工，我们已经参加过金工实

习，学习过钳工、车工，有的也可以由同学自己动手做。但对我们而言，办厂有两大难题，一是厂房，二是高温烧结炉。铁氧体的高温烧结，不可能在大楼、更不可能在实验室建设用于生产的高温烧结炉，而只能另建厂房。

学校一直处在基建时期，每年同时开工的大楼、房屋的基建项目总在十处以上，基建材料到处都是。校区内的大面积空地很多，建厂房的选址也不是问题。当时我们班主要在西二楼、西三楼上上课，学生宿舍也在西边，因而厂址就选在西三楼南面的一块空地上，当时那儿还有个小山包。我们建了个约

50平方米的厂房，这都是全班同学自己动手，打地基、拉红砖、运泥沙、砌墙、上窗、上门，是利用晚饭后、星期天的时间建造的。

厂房快封顶了，还缺少一根大梁。一天晚上约10点半熄灯后，我带领了班上的六个男同学去学校基建工地“偷”了根直径约25厘米、长约12米的杉树木材，这是下午我早“侦察”好了的。

大约晚上11点，路上已很少有人，六人抬着这根大木料，想着：“学生已经睡觉、老师也都休息，应该不会有人发现了。”我们正在东二楼与机械厂（现改为校史馆）之间的马路上往南走，突然校党委副书记朱九思从南边走过来。朱书记记忆力超强，对学校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教师都知道，如果他某天在马路上见到你，给你交待了要做某件事，看似在不经意的交谈中布置的工

作，几周之后，当再次遇上你时，他会问：“我上次要你办的某件事怎么样了？”我做学生时就知道这些，认为朱书记的记忆力简直神了。

现在我们遇上的正是学校这么一个很有权威的高级领导。他挡住了我们的去路，问道：“你们干什么？”我回答：“我们班办厂缺少一根梁。”朱九思又问：“你们是哪个班的？”我回答了，同时示意抬着木料的同学继续往前走。朱书记又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回答了，并说我是这个班的班长。接着他语调很重且慢，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们不能这么干呀！”随后向喻家山方向走了。

我大学毕业留校当教师后，曾多次向朱九思同志汇报工作，我相信他肯定记得我是那天晚上“偷”木梁的学生。

厂房建好了，校机械厂也把球磨机加工好了，但球磨机里面用的200公斤钢球学校不能生产。黄道开从黄石买回了钢球，货发到了汉口江汉关轮船码头仓库。我挑选了班上四名力气大的男同学，加我共五人，从学校借了一辆板车，拖着板车，吃了早饭出发，到武昌江边，乘轮渡过江到江汉关码头，去仓库提了货。两个大木箱，一个100公斤，五人合作抬上板车，乘轮渡返回了武昌。上到岸，已过中午，肚子都饿得直叫，看到从临江大道入中山路口的左手拐角处有一家饺子馆，我们将板车停在门口，进去吃饺子。几个人吃了一碗又一碗，从吃饭看，不像是学生，穿着也不像，又拉着板车，而胸前却挂着“华中工学院”的校徽。店里的一位中年女老板老盯着我们看，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人。她终于发问了：“你们是学生吗？”我们笑了，我们太不像大学生了。

班上负责技术的小组已实验了多次，

摸索出了原料配方比例：氧化铁多少（武钢炼钢的炉渣，不要钱，要多少都有），碳酸钡多少，等等；又通过实验室电炉摸索出了烧结的温度曲线和各温区的保温时间。厂房已竣工，屋顶是人字形，盖红瓦，其中掺杂了少量青瓦，是较大较厚那种；门窗都是旧房拆下不要的；外墙是红砖本色，墙面不太平整，内墙更是参差不齐，只粉刷了一小块；电源线已请学校电工接进了厂房内。厂房内的烧结炉也建好了，耐火砖用大炼钢铁留下的，采用反射炉原理，和烧制瓷器的炉子类似，只是我们建的炉较小，焦炭已运回了数千斤，通过控制鼓风机风量来控制温度。厂房内的布置依次是：鼓风机——烧结炉——球磨机，一字排列。

钢球运回后，球磨机可以将原料磨成细粉了，一切生产条件都具备了。球磨机磨出的细粉料要放在压模内用水压机压制成型后才能烧结。水压机得用机械厂的，他们白天上班不能让我们干，班上同学就在工厂下班后去车间压制，晚上排两班。

烧结好后要充磁，要用大功率电流，实验室电路功率太小，也得晚上工厂下班后去车间充磁。全班同学齐心协力，争着加夜班，终于生产出了合格的铁氧体磁性器件。一炉可以烧结近2000个，共生产了两炉，交给学校，听说很快卖出去了。

兄弟班的送话器也生产出来了。这时农村人民公社正在普及农村广播，我们两个班的产品正好能满足公社建设农村的广播网所需。这时已是1958年年底了。

1959年元旦，全班同学在自己亲手盖的铁氧体器件厂房内迎接新年，借来一口大锅，煮了自己种的200斤红薯。红薯甜极了，我们迎来了1959年的第一天。回顾1958年，真是过得酸、甜、苦、辣！

(二)

课程没有停，教研室老师围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讨论教学改革，提出了“以典型产品组织教学”和“单科突进”的一些新思想，并在学生中推行。循序渐进的课程体系打乱了，基础理论课程削弱了。同学们今天做这，明天做那，脑袋中一头雾水。

期末考试照常进行，由于同学们都不能集中于课程学习，都怕考试。很多活动是系党总支通过年级党支部、年级团总支和年级学生会安排布置下来。

学生按年级组织，无线电技术专业、自动控制专业、工业企业电气化、电机电器、发配电等专业都归属“电机工程系”。没有辅导员，年级党支部是一个年级学生的“最高领导”，一切活动全是学生做主。年级团总支、年级学生会都在年级党支部的领导下工作。党支部书记陈天照高中时就入了党，是我们年级学生的直接领导，在学生中的威望很高。陈天照后来留校当政治老师，后担任校报主编。我留校后和他一直有工作交往。

这些学生干部只得利用手中的权力，从考试前的一个月开始，停止一切活动，尽可能不召开会议，让所有的同学，特别是学生干部突击学习、看书、补作业。我通过一个月突击学习之后参加考试，往往考试成绩还不差，但考试过后就忘了。

1959年春，进行了又红又专，“插红旗、拔白旗”活动。首先是自我检查，然后是相互批评，每个同学都得“过关”，对于前一段劳动、教改不积极的同学会被认为是同学中的“白旗”，会受到集中批评。

正当我的思想惶惑之际，1959年夏，

学校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关于“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讲话精神。报告先在党内传达，记得是一天下午在体育馆听的报告。我于1959年3月3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们班学生中入党较早的党员。听了刘少奇同志的讲话之后，我感觉“松了一口气”，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终于知道学校的问题了！有希望了，学校今后将不会像以前那样乱糟糟的了。

听说刘少奇同志在全国推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后，去很多地方进行了调研，之后他为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劳动教育问题时起草了《关于两种教育制度的谈话提纲》。1958年6月前后，在刘少奇同志多次发表的讲话中，提出了较系统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思想。即“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现在工厂里面、机关里面八小时的劳动制度，这是主要的。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我想，教育部的直属高校，像华中工学院，当然是全日制学校，应该以教学为主，教学秩序不能轻易打乱。

到1959年下半年，也就是我们大三第一学期时，教学秩序基本正常了，我们的铁氧体厂没有再生产了，校内外劳动也很少了。我这一学期担任班团支部书记，不久又担任了年级团总支副书记。

1958年的全国“大跃进”之风，至1959年下半年也吹到了学校。1960年，学校办了很多新专业，如：核物理、半导体、电真空器件、无线电元件与材料、无线电导航、雷达、水声工程、电磁场与微波技术、无线电遥控遥测、无线电测量仪器、陀螺仪等专业。陀螺仪是控制洲际导弹飞行的重要部件。

初期，这些工作只是学校领导和教师的事，尚未影响到学生。新专业上马采取的方针是先集中教师搞科研，到师资条件成熟时再招收学生。

由于师资少，到1959年年底就开始抽调大四学生出来当教师了。当时大学是五年制，无线电技术、自动控制，相对于机械制造、电机电器等老专业，本身就是新专业，我校1956年才招收第一届无线电技术专业学生，大四是当时的最高年级。后来进一步扩展到抽调大三的学生了，我们班已抽调出好几个同学，1960年5月终于抽调到我了。当时我刚学完“无线电技术基础”，正在上电子线路的基础性课程，如“放大与整流”，还只学了约1/3。

抽调出来后，我被分配到陀螺仪专业，我不喜欢陀螺仪专业，因为这只是个“部件”，我喜欢搞“系统”方面的专业。系统专业才会涉及整机技术和整体思维，我喜欢整体思维。

我的性格是心里有话就要跟领导说说。1960年5月下旬，系总支通知我到一个教研组报到，离开了陀螺仪专业。这个教研组有七八个人，成员有班上同学王淑淇、马云秀、周明锦等，都是提前抽调出来的学生，研制一个海军单位交给的项目，我担任课题组组长。项目任务是研制一部无线电导航台，已有电路图纸，记得有大版面报纸那么大的2~3张图纸，是电子管的，苏联提供的。当时刚发明晶体管，还没有晶体管电路，所有电子设备都是电子管的。可能这是当时较先进的导航设备了。

我们买来元件，照电路图安装完了电路，但不工作，有仪器也不知道如何寻找问题和下手调试。电子线路不像机械，看得见摸得着，同一张电路图可以安装成不同元件

位置的电路板，电信号在电路中流动，看不见也摸不着。

在办铁氧体厂时，我们没有遇到过太大的技术困难，现在就完全不同了。面对电路，脑子一片空白！因为我们连专业基础课都没有学完，根本不懂电路原理。也请过刚大学毕业分到系里来的年轻教师指导过，一方面可能由于他们工作忙，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我们的水平太低，没能解决问题。

整天不睡觉，加班也没有用，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从何处下手。当时系总支书记是石贻昌，听说他解放前打过游击。每当总支书记到教研组检查工作，我送石书记走出实验室时，总会小声跟石书记说：“我想不睡觉，明天就搞出来，但是不行呵，没有学专业课，不懂呵！要‘又红又专’嘛，派我去进修吧？”

这时，学校已经派出一些教师到北京工学院、西北工学院、南京工学院等院校进



1975年，黄载禄在实验室工作时留影

修去了。石书记听了，不批评我，也不说话。但每次石书记来，我都会重复类似的话。

到了1960年9月中旬，总支人事干事通知我，立即办手续，去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电子科技大学）无线电遥控遥测专业进修，我真是高兴极了！当时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集中了全国最好的电子专家，很多从国外回来的专家都集中在“成电”。从1960年9月至1962年7月，我在“成电”的无线电遥控遥测专业读完了大学五年的后两年，这两年的学习打下了我大学本科的良好理论基础。

1962年7月30日，重庆开往武汉的轮船在汉口靠岸，我回到了我将服务的华中工学院，即将成为一名大学教师。

当我重新踏进华中工学院那曾经日夜加班的科研大楼时，再看看曾经难倒我们课题组的那个无线电导航台，我不用看电路都可以猜想出它的大致原理和各部分电路的功能，即使有些特别之处，我也有信心，它完全难不倒我。

回校以后，才知道那一课题下马了，“大跃进”期间创办的新专业多数也下马了，原课题组的人员多数又回到了学生班，重新当学生了。

回顾1957年9月至1960年9月在华中工学院度过的大学前三年，我不敢相信，我们班32个同学，没有老师的带领，学校也没有规定我们要办铁氧体厂，只是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鼓动下，在学校合理经费的支持下，完全依靠学生自身的能力，仅用了一个多学期，就一砖一瓦，从零开始，建成了50平方米的铁氧体器件厂房，建成了烧结炉，设计了球磨机、充磁机，摸索出了铁氧体的材料配方和烧制工艺，最终烧制出了合格产品。

我们在办厂过程中，经受了磨练，培养了团结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竟完成了那么多的事情，现在想来都觉得不可思议，不知道那是如何做到的。其解释只能是“团结就是力量”，是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是全班同学的高度政治热情，才使“不可思议”变成了事实。

现在回想那一段“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往事，我认为它在教育和培养学生的能力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不能完全否定，只是做得有点过头了，影响到了学生的正常理论学习，而产生了负作用。

另外，我们到处“偷”学校的建材，甚至屋梁，也是不对的。如果通过正常渠道向学校申领，可能还会得到工人师傅的指导和帮助，甚至学校会派车把建材运到工地，而不需要我们借板车一车一车拉了。

1962年7月，当我回到了华中工学院这片熟悉的土地，不少我们曾经开荒的菜地建起了教学大楼或教工宿舍，校区有了围墙，与我1960年9月离开时相比，虽然只过了两年，面貌却变化很大，学校的建设已翻到了新的一页。

（黄载禄：华中科技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系退休教授。曾任电子与信息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1994年被评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从小山村走向大武汉

◇ 李敏娟

(一)

我的求学过程，也是视野不断开阔的过程。从小学到大学，每升一次学，也意味着离家又更远了。

1974年，我出生在广西的一个小山村，父亲是小学老师，对我和弟弟的教育十分重视。20世纪80年代初，免费的义务教育还没有开始实行，农村孩子没有经历学前教育阶段，入学年龄也普遍较晚，多数8岁、9岁甚至10岁才进入小学一年级。同龄孩子还在家里帮忙放牛、干农活的时候，父亲就把我送进了我们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的小学，也是我父亲教书的小学学习。

大队的小学，离家约2公里，课程也简单，主课是语文、数学，另外还有思想品德、自然等副课，同学们对学习也没有多少兴趣，除了上课的时候，其他的时间都用在玩耍或者帮家里干农活上。汉语拼音是我们

最大的弱项，那时候普通话并没有普及，电视也很少，我们没有听过普通话，平时交流、老师授课用的是当地的通用方言——官话，与普通话差别很大。老师也不会讲普通话，就算是上语文课的老师，拼音掌握得也并不是十分好。所以每次语文考试，汉语拼音都是我们的丢分项。

小学的升学考试，我们要到离家9公里的镇上去考。升学考试的作文题目，我至今记忆犹新——《记一次升旗》。记忆很深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绝大多数农村小学根本没有升旗的条件，我没见过升旗，并不知道什么是升旗，我把学校组织春游时，队伍前面的同学举着旗子、师生一同游玩的事件当作一次“升旗”来写。但是后来，我收到了县城中学少数民族班的录取通知书，这给了我很大的惊喜。要知道，我们县只有县城中学开办少数民族班，且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面向全县的小学招生，能够进入实属不易。

我们家距离县城40多公里，从家里到县城上学，需要步行或骑自行车到镇上，再在镇上乘汽车去县城。初一上学期开学的时候，正遇秋汛，通往镇上的小河洪水迅猛，漫过河坝很深，人车都无法过去。为了不影
响我开学报名，父亲带着我，绕了很远的路，从小河上游的渡槽过河。路上，父亲还遇到了他的初中同学。这位同学在县城工作，毕业后他们就没有联系过，以致相遇时并没有认出彼此。后来在同行中聊天时，听说我们是当地人，便说到他有个同学在我们那里，并说出了我父亲的名字。这个巧遇，令他们兴奋不已。我们结伴同行，了解到父亲是送我去县城中学上学后，那位伯伯说，县城中学师资力量好，要我努力学习，将来还要上大学。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大学与自己联系在一起，但内心里依然觉得大学很遥远，与我不会有什么交集。要知道，我们村里之前仅出过一个大学生——我的堂伯父，他回家很少，在我眼里，那是个神话。



1995年，李敏娟在华中农业大学校园留影

初中离家很远，初中的学习生活，也开启了我第一次远离家人、在学校住读的旅程。每个学期，我要回两三次家，每次回家，既期待，又担忧。期待的是回家可以与家人团聚，担忧的是，每次回家，都要带四五十斤米返校。这些米对我来说，无论搬上车还是挑着走，都太重了。但是没办法，为了省钱，只能从家带米交到食堂换饭票，以免在学校断粮。

初中增加了一些新的课程，记得刚上英语课时，因为跟不上，我常常成为老师点名要求留下来加强学习的对象之一。初中的语文，我学起来也有点吃力。语文老师课堂上完全用普通话授课和交流，刚开始，想听懂老师的话都有难度。三年的初中学习生活，我在新奇、忙碌中度过。中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按老师的指导，我填了我们当地的地区高中（现在的河池市高中）。记得当时有句话说：上了“地高”（地区高中），就相当于一只脚踏进了大学的校门。漫长的暑假，我终于等来了录取通知书。高中我读的也是民族班，学校还给我们民族班的每个学生每月33斤米的饭票指标，不再需要从家带米到学校了。这里虽然陌生，好在还有熟悉的同学，我的初中同班同学包括我在内有6人考取了“地高”（当年在我们县招生总共17人），所以适应得很快。高中学习更忙碌了，我只有放寒暑假的时候才回家。

高考完，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了估分。我对自己的高考感觉很不好，估分的时候，给自己扣了很多分。我们对大学及专业的了解也不多，家人又离得远，填报志愿完全是自己做主。当时“农林师”都是鼓励报考的院校，填第一志愿可以优先录取。于是，我每批志愿都尽可能填一个农、或林、或师的院校作为第一志愿，心想只要有大学读就

满足了。但高考成绩却给了我惊喜，比我预估的分数高了70多分；录取院校也给了我惊喜，是华中农业大学园艺系果树专业。要知道，我已经做好回家务农的思想准备了，结果竟然考上了大学，而且还是全国重点大学，专业也是与我最爱吃的水果密切相关；学校所在地武汉，是我国知名的大城市，那里有黄鹤楼，有长江和长江大桥，令我无比的期待和向往。家人也很高兴，亲戚朋友也都纷纷表达了祝福。

怀着激动的心情，等来了开学季。我在父亲的护送下，乘坐20多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了武汉，从此便与武汉结下了不解之缘。出火车站，便看到学长学姐举着“华农”的牌子接站，在他们的指引下，新生及家长一同乘上去学校的车。开学报到很顺利，让我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

坐落于南湖边、狮子山脚下的华农，在20世纪90年代还比较偏僻。学校出去的公交车，仅有2路、22路到武昌火车站，55路到街道口；我读书期间，才增加了576路到司门口。也许正是得益于这样安静的环境，我们可以在广阔的校园里安心学习。华农的学习氛围很浓厚，上课没有固定教室，课间常常要赶路，从一栋楼跑到另一栋楼去上下一门课。晚自习常常要提前去占座位，去晚了的话就找不到座位了。曾经很多次，上晚自习找座位，我从一栋楼找到另一栋楼，最终还是没找到，只好返回宿舍。果树专业是华农的重点专业，实习的条件也不错，校内的园艺站是我们专业实践练手艺的地方，那里栽种有苹果、梨、桃、柑橘、葡萄等果树，还育有果苗；实习课的时候，老师会带着我们去修剪、嫁接，现场给我们讲解方法技巧、做示范。实习课也是我们最喜欢的课程。

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国家已经不包分配工作，而实行双向选择。毕业那年，不考研的同学，都忙于在各种人才交流市场穿梭，投递简历。我也向不少用人单位投了简历，其中有几个用人单位有签协议的意向，当时新洲县林业特产局（后来新洲改区后更名为新洲区林业局）领导到我们学校招人，我便去应聘，应聘成功后签了协议。

（二）

岁月如梭，时光飞逝，转眼间，我参加工作已21年，也由一名懵懂的学生，走上了单位的领导岗位。回顾过去，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组织的关心、领导的关爱、同志们的帮助。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新洲区林业局，被安排在林业局下面的余集林场工作。在这里，我由一个懵懂的学生，变为一单位职员，习惯于听从老师安排每一项学习任务的我，对怎样做好工作没了头绪。好在单位领导很体谅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学生，知道我们没什么工作经验，便安排有经验的领导、同事带领我们，做好花卉苗木的栽培管理工作，给我们增长见识和历练的机会。

在余集林场工作两年后，我调到林业局的另一个二级单位——林业技术推广中心工作，后来又抽到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办公室工作。在湿地办，对我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我增长见识、积累工作经验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去湿地办之前，我对湿地保护还从未有过接触，头脑里连湿地保护的概念都没有。我区对湿地保护工作的介入也才刚刚开始，这缘于世界自然基金会“恢复长江生命之网”理念的提出，而新洲区的涨渡湖，历史上与长江相连，由于围湖

造田等因素，涨渡湖与长江阻隔开了。涨渡湖的地理位置及其历史形成引起了世界自然基金会官员的关注，认为加强涨渡湖地区的湿地保护工作，对恢复长江生命之网，对恢复生物多样性有重要意义，并到林业局寻求合作，得到了林业局的重视。于是，湿地保护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区里成立了湿地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林业局。具体牵头湿地保护工作的，是当时林业局的一名副局长，参与到湿地保护工作的还有野保科科长、余集林场的一名副场长。在这里，时常需要组织一些交流、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也有部门的领导同志。按照领导的安排，我也负责部分会务工作。同时，世界自然基金会组织的一些考察交流活动，我也得以参加。这都是我以往没有过的经历。这些经历，使我的认识得到提高、视野得到开阔、工作得到历练。参与湿地保护工作近10年中，涨渡湖由普通的湿地，成为了区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市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并且申报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但由于种种原因，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没有申报成功。这几年，组织上也给予了我充分的肯定与关爱，我的级别由一名普通干部成长为林业局副调研员。

后来，组织安排我到新洲区旧街工作。到旧街不久，我参加了区委党校组织的区管干部培训班的学习。是年，恰逢换届之年，区工商联的换届如期进行，而此前从未与工商联有过联系的我，成为了区工商联换届的主席人选，我诚惶诚恐地接受组织的安排。学习期间，区工商联的换届圆满完成，我也成为了区工商联主席。1个月后，区“两会”召开，我当选为区政协副主席。不管当选为工商联主席还是政协副主席，我都感觉幸福来得很突然，此前从未想到过自己会得到

这样的岗位安排。如今，组织把这份厚爱给了我，既是对我的信任，更是对我的鞭策。我唯恐辜负了组织的希望，只有不断加强学习，提升能力素质，努力工作，尽心尽力完成好每一项工作任务，以回报组织的信任与关爱。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便是5年，又到了换届的时候，区民盟的换届也如期进行，根据组织安排，我任民盟区工委主委。同年年底，随着区“两会”的成功闭幕，我由区政协副主席转任区人大副主任。次年1月，我不再兼任区工商联主席。

（三）

2016年年底，武汉市政协委员的提名推荐开始进行，区委统战部传达部署了提名推荐工作，各党派基层组织可提名推荐一定名额的市政协委员人选。作为民盟区工委主委，我希望更多盟员有接受组织挑选的机会，于是酌情确定了提名人选名单，向市民盟沟通汇报，并向区委统战部报送提名人选名单。不久后，民盟武汉市委主委、专职副主委都亲自给我打电话，说提名推荐市政协委员人选，代表的是组织行为，作为区工委主委，理应是提名人选。考虑到不能辜负组织和领导的期望，我补交了自己个人的提名推荐材料。经过协商，我顺利地成为了一名市政协委员。

担任市政协委员后参加的第一次市政协大会，是在2017年年初。那一年，长江新城成为了讨论的热点，而我也因为在界别小组讨论时谈到了对长江新城选址的看法建议，受到了媒体的关注并报道。民盟界别还推荐我作为界别发言人之一，在政协的联组讨论上作发言。对长江新城议题，在会前，

我曾看到过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就很关注，并进行过一些调研和了解。我认为长江新城的建设选址，阳逻是非常适合的地方，在大会期间讨论时，我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长江新城的选址调研，由市政协牵头，一度成为全市关注的热点，经过多方论证，最终尘埃落定，长江新城的起步区为江岸的谏家矶到黄陂的武湖，阳逻在长江新城的规划面积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因为在新洲工作生活，对新洲的情况相对熟悉一些，我每次提交市政协的提案，主题多半与新洲相关，并聚焦阳逻。因阳逻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在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阳逻港是天然深水良港，是武汉新港的核心港，对发挥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的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国家航天产业基地也选址新洲沿江地带。阳逻承载的重任，不言而喻。尽管新洲区委、区政府倾全区之力于阳逻，但力量还十分有限，阳逻的基础设施建设、配套政策等方面，相对于阳逻承担的战略重任，还很不足。认识到这些问题，每次政协大会前，我都提前做好相关方面调研。与此同时，我也关注乡村振兴、城市建设管理、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并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撰写提案，在政协大会期间讨论发言时，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

政协，是我参政建言、履行委员职责的舞台，也是我增长见识、提升能力的平台。



2019年1月，李敏娟委员参加武汉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留影

每次市政协大会，我都全程参加；市政协及民族宗教委员会组织的活动，我都积极参与。也许是自己异常认真的态度，得到市政协领导和委员们的肯定。在参加2018年11月市政协组织在青岛学习的培训班及2019年5月市政协民宗委组织的在中南民族大学的培训班上，我都被推选为结业式上发言的学员代表，而我也欣然接受，并借发言的机会，把自己对培训的认识、体会、收获进行汇报交流。政协委员，是荣誉，更是责任；是动力，又是压力。委员的职责和使命鞭策着我不断加强学习，切实提高履职能力，认真做好本职工作，积极履行委员职责，努力发挥在本职工作中的带头作用、政协工作中的主体作用、界别群众中的代表作用。

（李敏娟：十三届武汉市政协委员，新洲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新洲区工委主委）

我的人生进化论

◇ 张 珺

校园创业：学生时代我就买了“大哥大”

1990 ~ 1993年，我在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读书。作为一名新闻专业的学生，当时我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尽可能地让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用实实在在的作品，证明自己的专业能力。所以在课余，我会把时间安排得很满，为自己寻找真刀真枪的写作机会。

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学的第一个长假，我便有幸进入到一家杂志社，开始了新闻实践。由此，我的署名文章不断出现在各大期刊杂志上。

这份扎实的成绩单不仅助力我当上了学生会主席，更重要的是，也让我“以文会友”拓展了交际圈，成了武汉媒体圈的一个“熟脸”。

可能是因为在媒体的实践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一位曾睡在上铺的学长找到了我。当时，他刚从南方回到武汉开服装专卖店，希望我帮他负责品牌宣传。

我在几乎没有犹豫的情况下就答应了他。后来，从设计开业庆典到各媒体投放广告，全都是由我一人操办。

不知这算不算“一炮而红”。此后，新的广告业务接踵而至，我甚至为了处理业务，买了一个特别时髦的“大哥大”，1万块的价格，当时堪称奢侈品了，而我不过是一名在校生。

用现在的话说，我还是一个非常注重品牌传播的人。那时候，在替朋友们打广告的同时，我也会在广告下方，留下自己的名字和电话，算是给自己也打了个小广告。

没过多久，我的业务范围开始突破“朋友圈”：一位火锅城老板打电话给我，请我

帮他做个开业宣传。广告款交到我手上，收条都没让我打。当然，我的点子让这位老板十分满意。

对方一家三口都长得胖，我为火锅城取名“胖胖”，但若单纯做开业广告，难以吸引眼球，于是有奖征集的想法便出现了——让市民在“胖”字后填空。

通过报纸、电台宣传，火锅城征名活动在武汉火爆上演，每天的市民来信要用麻袋装。这家火锅城也因此迅速打响名气，胖老板也让我赚到了人生中第一笔“大钱”。

大学毕业，我如愿进入某省报工作，但没做多久记者，领导就安排我参与筹办一份新报纸的创刊，采编与经营“一肩挑”。

也正是有了这段直接参与创刊工作的经历，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也让我发现了自己在经营方面的潜力与天赋。

专注展会：创造武汉的行业记录

在报社工作两年后，我正式“下海”，注册了自己的文化传播公司——“尚格文化传播公司”。虽然只有3名员工和一间14平方米的办公室，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已经很满足了。

1995年，卡拉OK成为百姓娱乐的最爱。当时我们与电视台合作，策划“镭射歌曲电视大奖赛”，并有针对性地招商，得到一家无线话筒厂商的友情赞助，新公司首战告捷。



2019年尚格年会暨24周年庆典上，张珺董事长作讲演

但彼时的武汉，广告业迅速发展，新广告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在竞争愈发激烈的环境下，我们该如何找到出路？

一次在广东出差时，一个偶然的机，我参与到同学的一次订货会，当时场面异常火爆，让我印象深刻。

回到武汉后，我斟酌再三，决定在订货会这个领域试一试。没有这个领域的经验，我还是秉承着一个新闻人的直觉去“抓热点”。当时皮革展非常兴旺，我就开始筹备做一场皮革展。

几经周折，最后这场皮革展在武汉港正式举办。通过这场展会的实践，我也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展会方法论：和卖产品一样，办展会也要有针对性、有节奏。

总结经验，指导实践，之后的展览一个比一个顺。

由此，我们也正式将“尚格文化传播公司”更名为“尚格展览公司”——放弃其他广告类业务，专事展览业。

其实1996年到2001年这六年，会展市场竞争的无序，使得会展资源严重浪费，

效率低下，更难找到成熟的商业模式。在各路英雄混战的市场状态下，大家都是一边不断尝试不同展题办展，一边思索民营会展企业发展的路径和模式。

直到2001年5月，当时全国房地产业发展如火如荼，一位结交多年的老友让我合股在北京办房产博览会。

当时公司流动资金不多，我卖掉了自己的汽车，凑够50万元北上办展。

与“行业风向标”的北京同行接触，着实让我大开眼界：在武汉，一个展位顶多卖2000元，广告投放不过几万元；但在北京，一个展位最高可以卖到6万元，广告投放都是一天一个整版。

经过一番思考，当年7月，我回笼资金，决定在武汉也办一场房产博览会。

2001年9月23日，武汉国际会展中心复建落成，一度只能在体育馆、武汉港到处打“游击”的展会企业，终于有了一座像样的“会客厅”。但对办展者来说，新展馆虽气派，其价格也令人咋舌，场租单价一下翻了3倍，还有中央空调、网络等诸多新设备的收费名目。

同行都在担心：成本剧增，哪有赚头？

但我却对新展馆和房产博览会信心满满。事实上，在新展馆还未建成时，我就预定了档期，准备摆出400个展位。

武汉第一场房地产博览会在当年的“十一”黄金周举行，一个9平方米的标准展位，被卖到8000元的“天价”，更是创下武汉的行业纪录！

自我变革：引入资本，拥抱互联网

2001年，有两个积极的信号被我捕捉到：其一，武汉国际会展中心落成；其二，

中国汽车产业的极速发展。我意识到，这对尚格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于是，公司果断地确定了汽车展这一主题，并于2002年成功举办了华中地区的第一个车展——华中国际汽车贸易博览会。

2006年，我们尚格的车展开进南昌，之后先后在南京、重庆、贵阳、郑州、南宁、鄂尔多斯、呼和浩特等城市举办。

华中国际车展由此“进化”为全国独创性的连锁办展商业模式，尚格会展也成为深耕全国二三线城市车展的“领头羊”。

后来，我参加了国内首家服务于成长型企业创始人群体的专业机构——黑马营。在那里，我见到中国最牛的那批企业家和投资人。参观了他们的企业后，我得到一个结论：要想把企业做大，在中国现有的环境下，借力资本是最好的选择。

2012年，在我的力主之下，尚格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一方面，尚格会展引进了国内最大的创投机构投资；另一方面，我也对公司管理层释放了股权激励。

我把自己做了十几年的企业分享出来，改变了公司的治理结构，于公司、于个人都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事实上，把做了十几年的“蛋糕”分享给大家，是需要巨大勇气的。我认为，一个人能打破利益层面的禁锢和纠结，那么就完成了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的突破，或许格局和境界就会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2014年，对于我和尚格来说，是非比寻常的一年。汹涌而至的互联网浪潮让我跟我的同事们感到深深的不安，19年的坚持与坚守，尚格大厦会不会一夜之间被与会展行业不相干的人摧毁？

强烈的危机感让我意识到，一定要变！既然要变，那怎么变？适不适合变？

从哪里下手？我相信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对我，也是困扰所有传统民营企业家的。

更新观念的第一步，我是从着装进行改变的：脱下套装，一改以前西装革履、拎着公文包的正儿八经的老板形象，我换上了休闲服，改头换面，以年轻姿态融入互联网的圈子里。

当时我频繁地走访“BAT”（中国互联网巨头百度、阿里、腾讯）公司，与互联网圈的朋友们进行交流，参加TMT（数字新媒体产业）圈的活动，学习大数据，学习互联网思维。

在学习的同时，也每天和自己较劲，思考怎样将新技术、新理念嫁接到传统的会展行业中去。

改变自己的认知还不够，关键要改变全体尚格人的认知。

2014年春节前后，我邀请了互联网大咖深入尚格，对我们员工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培训，主题就是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营销。

9月初，我带公司管理层奔赴厦门，走访了当地四家互联网公司和三家会展企业，包括美图秀秀、美柚等利用移动互联网迅速崛起的互联网企业。

当年，我们举办第十二届华中国际车展，便首度尝鲜互联网，试水“大数据营销”。

那次展会，尚格推出了“1元抢门票”活动。观众

扫一个二维码，填写信息，1元钱就可以买到原来价值30元的门票，还有机会获得明星演唱会门票、购物卡等礼品。

事实上，在提出这个计划时，大家都觉得十分不可思议。

因为对于会展业来讲，门票是重要的收入来源，少收一分钱就损失一分钱。如果每天有几万人得到优惠，那尚格每天岂不是要损失几十万收入？

不过事实证明，尚格“割肉”不但没使车展“票房”下降，反而增长了。更重要的是，借此活动，尚格一下子拿到了几万名潜在购车者的精准数据。

以前我们只专注于参展商，不专注观众用户，观众入场每人买30元的门票，我们不知道他姓张姓王，进去干什么，根本没有进入到后面汽车销售的交易环节，也相当于放弃了相当大的利润机会。然而，互联网时代，数据就是价值，数据的采集、挖掘和增值是现代会展产业为参与各方带来的主



2019年1月，张璐委员在武汉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市长与政协委员座谈会上起身举手发言

要收益之一。一年之中展会就只有3天、5天，剩下的360多天怎么办？只有利用互联网工具为客户创造新价值，打造永不落幕的会展。

干掉旧思维，让自己新生；进化新思维，让自己跨越。我认为，任何企业都可以拥抱移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商业逻辑和传统商业逻辑完全一致，未来也不会再去刻意强调互联网融合，因为它将成为一种常态，与传统企业完全融为一体，产业互联网将会有无穷的生命力与价值。

企业文化：“夸父精神”进化下的尚格人

来过我们尚格的人都知道，尚格有一个独特的仪式，出了电梯，就有人在门口排队迎接，随后在专职讲解员的陪同讲解下，所有访客先要到尚格二十几年历程展的回廊里走一圈，去感触一个民营企业发展的历史。

那究竟是什么动力推动我们尚格人将一个不可能变成可能？我想原因有很多，但总结出来只有简简单单的十六个字——“志存高远，旷朗无尘，坚韧不拔，生生不息”，这也就是尚格人崇尚的“夸父精神”。

很多的时候我都在思考，也不断地通过实例去印证，是尚格人成就了今天的尚格，“人”是尚格最为宝贵的财富；而我们独有的企业文化打造了坚韧、进取、有凝聚力、有活力的尚格人。

尚格每年会举办两次夸父堂荣光典礼，这是尚格新员工入职的标志性活动，同时也会对不同工龄的老员工颁发不同类型的“夸父奖章”。夸父这一精神图腾已经融入到公司每一个角落，激励着一批批的尚格人。

一段时期，汽车市场下滑对车展带来

了影响。我的认识是：世界上没有绝对一直向上的事物，尚格的成长曲线也是如此。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进化的过程，都是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我们不能操之过急，要在迷局中寻找新的突破，要像登山一样每一步都走稳。

由此，我提出两个方向的思考：一个是个体之于时代的价值。尚格在武汉会展企业中，在中国民营企业中处于怎样的位置？毋庸置疑，我们将自己置于整个时代中，在整个社会生态平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一个方向的思考是你进化了吗？从第一个思考推及到个人，我们每一个人之于企业处于怎样的位置，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要坚守决不荒废青春浪费生命，把时间用在美好的事物上，年轻就是资本，要勇于试错。

在尚格总部最醒目的地方，挂着一句富含哲理、令人深思的标语——“从来，看未来”。我认为，这不仅是尚格的企业标语，更是尚格的经营哲学。

“从来，看未来”，就是注重历史，每个人的历史都是自己书写的，你怎么走过来，决定你发展的未来；就是注重当下，当下每一天都是在书写历史，做好当下，才能拥有未来；就是面向未来，用未来激励当下，要有站在月球看地球的格局与视野。

我们每一个尚格人都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从来，看未来”的哲学，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为尚格寻找持续发展的方向和动力，让尚格长久地活下去，并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反哺社会：为会展行业发展建言献策

会展业普遍流传着这样一个结论：会展业具有1:9的产业带动效应。即如果会

展业的直接收入是1，其对交通、旅游、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的带动收入则是9。因此全国各地都非常重视会展经济，大大小小的展会已经成为各大中城市当下经济生活的一部分。风生水起的展会背后，是行业活跃度与经济聚集效应的最佳反映。

武汉正大力培育会展经济，推动建设国家会展中心城市，为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发展释放强大功能。

作为商务部第一批展览业重点联系企业、湖北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武汉市现代服务业领军企业，同时入选湖北省上市后备企业“金种子”计划的尚格，在武汉建设“会展之都”的征途中责无旁贷。2018年，尚格会展荣获了“武汉市服务业企业100强”称号。“武汉市服务业企业100强”是由武汉企业联合会、武汉企业家协会在广大企业、各区企联、企协及有关行业协会、商会的支持及参与下，参照国际通行做法，以2017年度企业营业收入为标准而进行的百强排序。近年来，尚格会展的纳税总额保持了强劲增长势头，为社会作出了贡献，从而又入选“2018年湖北省服务业企业100强”。2017年，尚格的同事们还和全国道德模范董明一起，走进农民工子弟学校春苗小学进行捐助，展示了企业的担当和责任。

我于2011年成为十二届武汉市政协委员、2016年连任十三届武汉市政协委员。在经营公司业务的同时，我认真履行委员职责，积极参与界别、专委会的各种调研、培训、学习等活动，提出提案，为武汉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发声。针对武汉展会水平与国内领先城市尚有差距的问题，我提出了“打造会展集团军，构建会展中心城市”的提案。连续几年的政协会议期间，我积极参加市长与政协委员座谈会，为武汉会展业发展建

言献策。我指出：本地知名大展数量不多，专业展大多生存艰难，消费展大多生命力脆弱。特别是武汉本地培育的专业展，运作的会展公司大多实力较弱，同时受到外来同类型、同题材展会冲击。消费展更是存在展题高度重复、恶性竞争的局面。为此，我提出建议：打造本土会展企业集团军，共同做大武汉本土的品牌会展公司和品牌展会项目；提高展会市场化运营力度，尝试以公开招标的形式，将原有政府主导的会展项目交由专业会展公司运营，逐步形成市场化运作为主导的会展模式；加强国际化与智能化建设，建设智慧会展城市。我相信，在政府、企业、市民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擦亮武汉“会展之都”的名片。

当下，中美贸易战势必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冲击。作为民营企业企业家，我认为我们不仅会遭遇更多的挑战，也同样会面临一些新的机遇。在如此环境下，真正好的企业，真正愿意做事的企业家，都会随着发展质量的不断提高，更加彰显其价值。

唯进化，方生生不息；唯进化，方绽放美丽。

（张珺：十二、十三届武汉市政协委员，尚格会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的父亲李蕤与《长江文艺》

◇ 宋致新

2019年是《长江文艺》创刊70周年。

《长江文艺》创刊于1949年6月18日，比新中国成立的国庆日还要早上几个月。它被誉为“新中国文艺第一刊”，经历了漫长的70年岁月，仍屹立文坛，确是值得庆贺的事。与此同时，人们也自然会想到创刊初期筚路蓝缕的艰辛。

（一）

中国的解放战争由北向南推进，河南的解放先于武汉。1948年3月洛阳解放，10月开封解放。1949年3月28日，中原文艺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开封召开，会后成立了“中原文协”。

我的父亲李蕤，本名赵悔深，河南荥阳人。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是活跃在河南文坛上的青年作家和新闻记者。1936年，

他考入河南大学文史系，不久参加“北方左联”。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即离开河大，到郑州《大刚报》当一名记者，采访过台儿庄大捷，在徐州参加范长江领导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抗战中他担任《阵中日报》《前锋报》《中国时报·前锋报》联合版等报刊的副刊主编、主笔等，1943年曾不顾禁令采访报道了河南大饥荒，1940年和1947年因坚持抗日、争取民主两次被捕入狱。1948年秋携全家奔赴洛阳解放区，到宝丰县中原大学学习。1948年年底，奉派到开封市委机关报《开封日报》主编文艺副刊。1949年3月28日，中原局中原文艺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开封召开，父亲出席了这次会议，任筹备委员。

形势出人意料地迅猛发展。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了。中共中央中原局派遣大批文艺干部随军跨过长江，聚集武汉，

把原本准备叫《中原日报》的机关报改为《长江日报》，把《中原日报》的《文艺》副刊改为《长江文艺》。

当时解放区文艺干部奇缺。《长江文艺》创刊号，是由中原大学政治教员俞林一人编辑的。中原大学设在开封河南大学原址，1949年6月，俞林将编好的稿子送到郑州中原日报社印刷。6月18日，《长江文艺》创刊号出版了，版权页标明编辑为：“中原文协筹委会《长江文艺》编委会”。除了1946年12月东北文协创办由草明主编的《东北文艺》外，从全国范围看，《长江文艺》就是“新中国文艺第一刊”了。

1949年7月1日，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开幕，于黑丁、李季和我父亲作为中原地区文学界代表到北平参加了这次盛会。俞林也是第一次文代会代表，但为了编《长江文艺》的稿子，放弃了参加会议。在郭小川的帮助下，俞林把编好的第一卷第2期稿子交给新成立的新华书店付印。于黑丁等参加文代会回武汉不久，《长江文艺》第2期已出版了。那时，《长江文艺》还没有一个正式编辑，更不要说一个编辑部了。

于黑丁、李季等到武汉后，白手起家筹办《长江文艺》。于黑丁从《长江日报》要来了两个助理编辑马汉章和王黎拓，在中山公园借来一间文娱室，这就是“中南文联筹委会”的最初班底。

为了有个固定办公地点，李季等又冒着酷暑到处找房子，终于在黎黄陂路找到了一家歇业钱庄的空房子，这便是《长江文艺》第一卷第3期上刊登的“黎黄陂路三十五号”，电话号码是

三四一四，在门口挂起了“中南文联筹委会”的牌子。以后，这里又挂上了“中南作家协会”的牌子。

黎黄陂路一带过去是英法租界，房子大都是洋房，居民房也是坚固的砖石所砌。

“黎黄陂路三十五号”中南文联筹委会的办公地点，如今是黎黄陂路33号，是江岸区交通大队一、二中队所在地。进巷子走到头，右边是一栋四层楼房，有两个门栋，靠里的一个门栋，当年是中南作协职工宿舍，外面一个门栋，就是中南作协办公地点。《长江文艺》编辑部和图书馆设在二楼，三楼有个大会议室，叫“文艺厅”，在那里可以举办集体活动；另一个门栋，住的是早期中南文联的职工，有于黑丁、李季、田涛、李冰等。

到1950年1月，《长江文艺》已出满了第一卷，此前编辑部只是一个临时班子，这时才正式成立编辑部，改编委制为主编制，李季任主编。《长江文艺》最早的一批编辑，大多是中原大学南下工作队的成员。



汉口黎黄陂路33号，曾是《长江文艺》杂志社最早的社址和中南作家协会最早的会址。宋致新摄

(二)

1949年8月5日，李季和我父亲在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后，一同乘火车到开封。途中李季吟成了一首诗歌并题赠给我父亲：

中原有荒园，畦畦皆枯苗。
辛勤灌溉者，持壶频频浇。
一日复一日，一朝复一朝。
花儿渐见绿，朝朝开花早。
花开娇且艳，园丁日渐老；
每望满园花，相视皆含笑。
告彼灌溉者，莫厌花之交；
鲜花朵朵红，君岂无功劳？

——一九四九年八月，与悔深兄同道由平返汴，途中偶成俚句数章，深愿以此自励，并书赠悔深老兄，以答雅嘱，兼共勉之。

李季 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开封）

此时李季正准备回武汉创办《长江文艺》，我父亲也奉命回开封筹办《河南文艺》和《翻身文艺》。李季在这首诗中把文艺编辑比作辛劳的“园丁”，包含着对编辑奉献精神的歌颂与同行之间的互相勉励。

1952年3月到11月，我父亲参加巴金率领的“赴朝写作组”，到朝鲜前线生活了8个月，回国后出版了通讯报告集《在朝鲜前线》一书。他在朝鲜前线收集了大量生活素材，本想辞去在河南省文联的行政职务，专心搞写作，在北京时已征得中国作协领导的同意。但不久即接到上级调令，让他赶赴武汉，担任中南作协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

原来，1953年春，李季奉派到我国第一个大型油田——玉门油矿深入生活去了，父亲接替了他的工作。于黑丁是中南作协主

席、《长江文艺》主编，但他的工作繁多，不能把主要精力用来办刊物，父亲便担负起《长江文艺》的编务工作。副主编还有俞林、田涛，俞林抓创作，田涛负责出版事宜。

1953年春，我父亲带着哥哥姐姐先从开封来到武汉，由于我们家来得比较晚，就住在中南作协隔壁的一个叫文记里的巷子里。这个巷子，与中南作协的巷子只有一墙之隔，墙上开了一个小门。这年8月，我母亲带着奶奶和我，把整个家都搬来了。我家人口多，散住在一楼和二楼的几间房子里。李文、沈毅夫妇，丁明顺、曾立慧夫妇，还有莎蕪夫妇等都住在那里。我记得住房围绕着一个天井，到二楼要走天桥，住处的楼梯和楼梯扶手都是木质的。我们搬家时，除了日常用品外，大的家具如书柜、绷子床、沙发、茶几等都由公家配给。我母亲宋秀玉，原在河南省妇联任《河南妇女》杂志编辑，到武汉后，分配到位于黄兴路的中南出版社教育组，负责编纂教材。

父母都全力以赴地投身工作。我的哥哥姐姐，被送到解放公园路（原汉口西商跑马场）的中南育才子弟学校作插班生，我被送到位于汉口花桥的中南育才幼儿园，兄妹4人全寄宿，只有星期日才能回家。我那时才4岁多，对寄宿生活甚感孤独寂寞。哥哥姐姐在学校也有顺口溜：“过了星期三，时间猛一窜，过了星期五，还受一天苦”。孩子们都巴望星期日早点到来，好和父母团聚。家里平时只有一个从河南带来的老保姆照顾奶奶，父亲经常出差、采访，很少过问家事。

放假时我们也到机关办公楼去玩。三楼“文艺厅”星期天经常举办舞会，为了方便跳舞，地板上洒了滑石粉。有一次，《长江文艺》编辑部两对新人结婚，在“文艺

厅”摆上喜糖、茶点等，大人们都来庆贺。我和姐姐也跑去了，抓了一大把糖果，顺着洒了滑石粉的楼梯连滚带溜地往下跑。那几年机关气氛很宽松，女青年夏天穿着花布做的“布拉吉”（连衣裙），办公楼里经常回荡着《喀秋莎》《三套车》的歌声。

武汉是建国初期的重镇，中南局辖六省二市（豫、鄂、湘、赣、粤、桂；武汉、广州），《长江文艺》是中南大区的文艺刊物，编辑部责任大，任务重，制度也很严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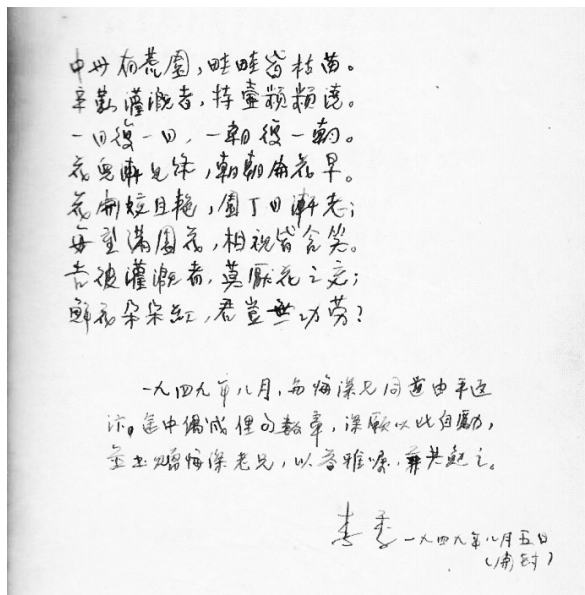
据老编辑们回忆，《长江文艺》编辑部分为评论组、小说组、诗歌组和收发组。各组采取分工负责制。

在我父亲到《长江文艺》之前，李季已经打下很好的基础，编辑们大都是中原大学年轻学员，文化素质较高，编辑部已建立了严格的制度，使父亲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编辑部制度为：来稿必复。基础较差的稿子，要用印好的退稿单退回；稍有基础的稿子，编辑要亲自给作者写信，指出优缺点，说明准备退稿或希望修改后再用；对于作家来稿，更要慎重处理，常常由编辑先提出意见，交组内讨论，然后给作家回信说明准备采用或是修改。这些信写好后，还要交给组长审查后再发。

编辑部还有定期政治学习、业务学习，对党的文艺政策、办刊方向、培养新生力量以及来稿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等都要学习和讨论。特别是编前会议，各组要拿出预先选好的稿件，经集体讨论决定是否发表。

不少老编辑回忆，我父亲在《长江文艺》时，工作认真、作风民主、为人谦和。开会时，他总是让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这一时期，编辑部里热气腾腾，大家不分上下班，晚上办公室常常灯火通明。我至今还记得父亲站在马路边与同事热烈讨论；记得



1949年8月5日，李季路过开封，诗赠李蕤，互相勉励

许多叔叔到我家来边抽香烟边聊天；记得一觉醒来，父亲还在浅绿灯罩的台灯下伏案写作……从1953年春到1957年春，父亲在《长江文艺》工作4年，刊登了不少新人佳作，如吉学沛、李准、公刘、未央、刘真的小说，海默的电影剧本，公刘、白桦、韦其麟的诗，徐懋庸、宋谋瑒的杂文等。

父亲分工管评论组，自己也写一些文学评论，发表在《长江文艺》上，如《试评高秀山回家》（1954年第2期）、《大风暴前夕的农村画图》（1956年第1期）、《评一面小白旗的风波》（1956年第3期）、《温故而知新》（1957年第5期）、《充分发挥短兵器的威力》（1956年第3期）、《不是唯一的，但是最好的》（1957年第3期）等等。

1954年夏天，武汉爆发特大洪水，父亲不仅组织《长江文艺》进行专题报道，自己也操起记者老本行，深入抗洪第一线现场采访。据母亲回忆，那些日子父亲差不多天天都在大堤上，关注长江水位变化，哪里

有险情，哪里有抗洪抢险的动人故事，他就赶到哪里采访。他写了长篇通讯《和洪水搏斗——写给关怀武汉的人们》（1954年第9期《长江文艺》刊登并被《新华文摘》转载）、《移山倒海的人民力量》（收入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防汛纪念集《和洪水搏斗的武汉人民》一书），他还写了短篇小说《三代人》，把1954年的抗洪斗争和1931年长江决堤后的惨景加以对比，反映新旧社会的巨大变化。

武汉长江大桥从1955年9月开始兴建，但前期准备工作比这个时间要早。1955年8月15日，我父亲就发表了报告文学《长江大桥工地的日日夜夜》（1955年9月《长江文艺》），介绍了大桥首创的施工法——“管柱钻孔法”和许多普通建设者。当时武汉市政府发给我父亲一个“特别渡江证”，为他采访长江大桥的建设提供便利。父亲不仅常到汉阳龟山的大桥工程指挥部采访指挥员，还经常坐着小艇，到江心去观察大桥桥墩的落成，与工人共同体验建设中的艰险与喜悦。

1955年，我母亲所在的中南出版社从黄石路迁到新华路，当时公共汽车很少，交通非常拥挤，母亲上下班不便，加之奶奶年老多病，家务无人主持，就由于黑丁做主，把我母亲调到《长江文艺》编辑部小说组任编辑，以便兼顾家庭。

（三）

1956年10月，父亲受中国作协委派，到朝鲜参加作家代表大会，之后又去波兰参加作家大会，1957年初刚回国，便赶上了“大鸣大放”。他响应号召，参加了市委邀请文艺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并发表了两篇后来

被称之为“毒草”的杂文，一篇是《注意脚下的小草》（《长江文艺》1957年第6期），一篇是《谈嗅觉》（《桥》1957年第3期）。

《注意脚下的小草》是为女作家刘真鸣不平的，刘真写了一篇《谈“鞭打”》的文章，批评了某地个别农村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文章投到报社后，被报社领导认为有思想问题，不予发表。我父亲认为，在今天，仍然存在官僚主义，这就涉及了社会主义文艺还需不需要揭露生活中的黑暗面的问题。另一篇《谈嗅觉》，举出一个老干部把房里热水瓶塞子的“突突”声误认为是敌人发电报的真人真事。父亲认为，和平建设时期，不宜把斗争的弦绷得太紧。没想到，这两篇短短的杂文，后来却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在反右运动中，我父亲被划为“极右派”，连刚刚调到《长江文艺》不久的母亲也受到牵连未能幸免。

经过运动，《长江文艺》编辑部18个员工中，打出我父亲李蕤、母亲宋秀玉、周勃、姜弘、林焰、左介贻、张简（美编）等7个右派。《长江文艺》编辑部打成右派的比例竟超过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实在触目惊心。

这以后，父母和我们整个家庭在生活上和精神上所受到的磨难，自不必多说了。所幸的是，到了1978年，经过了20年，父母的冤案终于平反。当年的“毒草”，后来又被收入《重放的鲜花》。1997年，我父亲在《李蕤文集》的代序中写道：

一九五七年春，党号召整顿三风：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我认为这是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大扫除，理应抱着对党的一贯赤诚，积极参加。因此，除对机关内部的党员领导同志提了一些逆耳的谏言之外，也写了《谈嗅觉》《注意脚下

的小草》两篇短文，对社会上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进行针砭。结果是，正在翻箱倒柜打扫卫生的人，忽然变成了前来打家劫舍的强盗——我被划成“极右派”，《谈嗅觉》《注意脚下的小草》两文，也被列为“毒草”，并列入《右派言论集》中，作为永不能翻案的“罪证”。自此，我手中的笔被夺走了，我失掉了创作的权利，而且长达二十年之久。

这场阶级斗争扩大化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损失，是人所共知的，在此不再赘述。不少当时被打成“毒草”的作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考验，再用清醒的眼光看一看，又被誉为“重放的鲜花”。我在这个文集里，重新收入这两篇文章，倒不是认为它们是什么“鲜花”，应当“重放”，而是想说明，它们和我的其他文章一样，出于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一片赤诚，而决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希望今后的有权有力的人，千万不要只凭嗅觉办事，重演这样的悲剧。

1958年春，汉口解放公园路新建的文联大院竣工了。大院由一栋L形的办公大楼和三栋红砖盖的宿舍楼组成，院内场地广阔，有食堂、篮球场、养鱼池，四周种满了各种花木，环境之优美，在当时实在是少见的。

由于1955年中南局撤销，中南作协也随之更名。1958年文联大院的办公大楼门前，挂有4块牌子：“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中国美术家协会武汉分会”“中国音乐家协会武汉分会”“中国戏剧家协会武汉分会”。《长江文艺》编辑部属于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也在这座办公大楼办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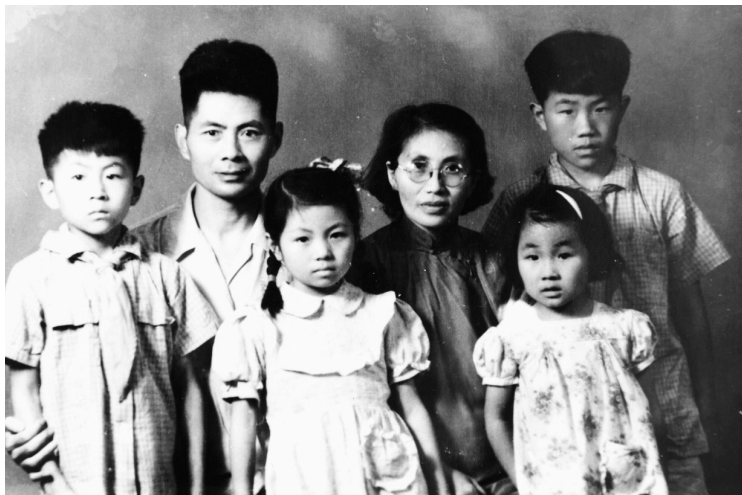
据我母亲晚年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中南作协在黎黄陂路办公时，由于会址设在闹市区、作家们居住得分散，不利于工作和写作，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时，我父亲和其他代表就此事向周恩来总理反映，后来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在汉口解放公园路郊区划出一大片菜地，建设了办公、住宿一体化的文联大院，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优越的工作和写作环境。

但1958年我的父母搬进文联大院时已被划为右派，与《长江文艺》无缘了。父亲被下放到东西湖劳动改造，母亲留在大院喂猪种菜。一直到1960年他们先后摘帽，父亲被分配到武汉市戏剧研究室，母亲被分配到武汉市文化局管理图书。

1966年“文革”爆发，文联大院成为重灾区。

1968年年底，文联大院的职工绝大部分下放到干校、农村，当时省、市文联已分家，省文联干部下放到湖北沙洋，市文联的干部下放到湖北崇阳，文联大院人去楼空。后来这里的房产收归房管局，变成大杂院。

直到“文革”后期，文艺干部纷纷回城。停刊多年的《长江文艺》也重新复刊。



1955年夏，李蕤夫妇和子女在武汉合影

由于它是省文联的刊物，一度在武昌紫阳路过渡，后来又搬到东湖东亭新建的省文联大院去了。

(四)

1978年，武汉市委专门发了文件，为我父亲平反。父亲和母亲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由于历史转折时期人才青黄不接，1982年6月，武汉市作协成立后，父亲当选为市作协主席，并任《芳草》杂志主编。

这时父亲已经是71岁的高龄，他认为，不要纠缠于历史旧账，应利用余生多做些有益的工作，继续培养文艺新人。1985年，由他联系全国各地的老作家、诗人和艺术家等，召开了全国性的“黄鹤楼笔会”，以后还组织作家深入基层，开展报告文学的写作。

1988年年初，文联换届改选，父亲辞去武汉市作协主席职务，离休那年他已是77岁高龄。

父亲一生历经战乱、颠沛流离，磨练出坚韧不拔的意志，他心胸开阔，为人宽厚，虽在《长江文艺》工作时期蒙冤受屈，却不计较个人恩怨。1994年《长江文艺》创刊45周年之际，父亲写了《一个文艺老兵的祝贺——纪念〈长江文艺〉创刊四十五周年》，他回顾了《长江文艺》创刊的历史后，说：

我们的《长江文艺》，四十五年也是如此。从总体来说，主流来说，是伴随着祖国的步伐前进的，和人民的命运血肉难分的。《长江文艺》编辑部，从李季开始，树立下“无条件为人民服务”“和作家交朋友”“做青年作家的理发员”的良好风范。这个风范一代一代，至今不变。他们甘心

做无名英雄，甘心做燃尽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呕心沥血，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新的作家，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自然，前进的道路不是笔直的，不可避免地有“左”和右的干扰，但正如东流的长江一样，大方向是从未改变的。这宝贵的传统，值得永远保持和发扬。

省、市作协虽然分家，一个在武昌，一个在汉口，但我父亲和省作协原《长江文艺》编辑部许多老同事还保持着友谊。1998年元旦，父亲去世前的十几天，他用邮政贺年片给亲朋好友送上新年祝福，收到父亲贺年片的，有好几个是原《长江文艺》的老同事或其遗孀。

1998年1月14日，父亲因心肌梗死猝然去世。

事隔一年，1999年1月14日，在武汉市委宣传部、武汉出版社和武汉市文联联合举办的《李蕤文集》首发式上，原《长江文艺》编辑沈毅发言，提到父亲去世前不久，还给他和妻子李文、以及苏群（蔡明川）的老伴王淑培写贺年片，惦记曾在《长江文艺》共事过的同志。这件小事，使他们很受感动。

从1953年到1957年，父亲在《长江文艺》担任4年的副主编。父母在《长江文艺》曾蒙冤受屈，“文革”中再次罹难。幸运的是，他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岁月。父亲因历史机遇而浴火重生，以文品和人品为自己的一生划了圆满的句号。

1953年，我父亲奉调举家南迁武汉时，我们兄妹还都是孩子，自此以后便改变了生活的轨迹，在这里一直生活到老年。武汉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

（宋致新：李蕤小女儿，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已退休）

一个武汉人在巴格达的工作经历

◇ 张智海

我是个地道的武汉人（祖籍黄陂），改革开放初期，有幸作为一名工程技术人员“走出去”，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工作了一段时间。其时，两伊正在酣战。在那里，我目睹了战争的残酷（还经历过几次险境），领略了中国企业初闯国际承包市场的不易，见证了中国派出的第一支石油钻井队在伊艰苦工作为国争光的英雄壮举，感受了工作在异国之人对祖国家乡的思念之情。在巴格达的这段经历，是我人生路上的重要节点，对后来的工作与进步影响很大。

先说说我是怎样去到巴格达的。

1963年，我于武汉城建学院毕业，国家统一分配到石油工业部第一工程公司工作。此后近20年间，我辗转于辽宁抚顺、山东淄博、河南洛阳等地，从事技术业务和企业管理。1978年末，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次年我国便开始了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的探索和实践，于是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CPECC）应运而生（1980年6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与石油部基建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成为全国石油战线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对外窗口。1981年初，我在石油部举办的“国际承包工程讲习班”学习三个月，继而参加两个对外合作项目的洽谈之后，被借调至CPECC，一干就是六七年。

1985年春夏之交，我参加CPECC赴伊拉克（项目投标）考察组，从首都机场搭乘伊航班机（那时北京至巴格达有直航），取道西南经停印度孟买，再沿霍尔木兹海峡穿越波斯湾，飞行一整天于夜半抵巴格达，住在CPECC驻伊办。考察组在伊停留23天，回国前，因拓展市场和项目洽谈需要，组织

上决定我留下转入 CPECC 驻伊办工作，便在巴格达住了下来。

袭城战躲飞弹逃离巴格达

当时已是两伊战争第五年，热天在北边打，冷天在南边打，几乎成了规律；时下正值冷热交替，所以主战场还在南边。不久前（二三月份）双方打过一场大战（伊朗伤亡惨重），随后升级为“袭城战”，即以飞机（远程轰炸）和炮（导）弹攻击对方城市以制造恐慌。

我们考察组抵伊向我驻伊使馆报到后，从巴格达走 6 号公路去南部油田，全程 650 公里，其中阿玛拉以南 100 多公里为战区。驶入战区，只见公路沿线重兵集结，高射机



1985 年 11 月，张智海（左）与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CPECC）驻伊办葛经理在办事处办公楼前合影

枪、大炮、坦克，壕沟、掩体、兵营，还有萨达姆的巨幅彩绘画像，一一从我们眼前闪过；村庄颓废，空无人烟，好一点的民房成了军事指挥所；路旁多处被伊朗炮击打塌的高压铁塔扭成一团躺在地上，不时还可见装载辎重或导弹的大车隆隆驶过，场景令人生畏。考察期间，有一天我和翻译去巴士拉给南部油田总部送函件，刚走到市内一条街口，就听到尖厉的警报声响起，这是要人们赶快躲避伊朗的炮击。街上行人闻声四散奔跑，我们惊慌不知所措，瞥见街对面几个扛枪的伊拉克士兵喊叫着向这边使劲招手，便和一伙伊拉克人撒腿跑过去。刚躲进一家商场门前的掩体，便听到几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炮弹落在不远处阿拉伯市场内，随即升起一股浓烟。我哪见过这阵势？吓得心里怦怦直跳。

结束南部油田的工作，考察组回到巴格达做总结。几天时间里，伊朗先后向这里打来两枚导弹，其中一枚就落在我们住处附近。那天约莫下午 7 时许，我与翻译正在办公室伏案工作，忽听到外面惊天动地“轰”的一声，房屋随之一颤，透过从狭小窗户射进的一缕斜阳，可见天花板上的灰尘纷纷掉落。我们连忙爬上三楼顶层平台察看，一两公里外冲天腾起的一柱黑烟在空中慢慢散开，附近房顶平台上，见惯不惊的巴格达市民叽叽喳喳，指着那股黑烟边议论边比划。隔日，我们在底格里斯河边的解放广场街头，看到昨天导弹炸出的大坑，足有五六米深，七八米直径焦土飞溅的周边以破木板遮挡围起。这枚导弹威力真大！是否伤人不得而知。

6 月 13 日晚，CPECC 驻伊办葛经理去使馆参加紧急会议回来传达，据来自日本使馆的可靠消息，次日上午伊朗首都德黑兰要举行战时誓师集会，届时伊拉克战机

将前往轰炸，而伊朗也会以多枚导弹袭击巴格达，日本使馆已在连夜撤离人员；我使馆要求在巴格达的中资机构人员白天尽量不要外出，有条件的可到外地躲避一下。大家听了紧张起来，连夜准备，除了葛经理和会计师留守外，其他人员和国内来的考察组，翌日清晨带上干粮和水，驱车奔往费卢杰方向，去到巴格达西北 100 多公里外的塞尔萨尔湖“避难”。我们惶惶不安地在那里待了一天，直到天黑才回城，幸好平安无事，只是虚惊一场。事后打听得知，伊朗方面因故临时取消了那天的战争动员大会，袭城战也就“暂停”。

考察组回国了，我留在 CPECC 驻伊办工作。我和翻译遵葛经理之嘱，再次去南部油田，了解巴士拉炼油厂检修（改造）计划和招标情况。这里离前线不远，实行军事管制，值守军警荷枪实弹，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外来车辆一律禁入，我们只好乘厂部的车进去办完事再送出来。翌日回巴格达仍走 6 号公路，刚进战区便听到前方传来砰砰的大炮声，我有些紧张地对翻译说：“两边莫是打起来了！”翻译却说起了俏皮话，“要是真的打起来，让我亲眼见一见，那才好哩！”炮声越来越近，路上的车也越来越少，我害怕地说：“前面太危险，还是折返巴士拉走 8 号公路回巴格达吧！”翻译说：“那就绕得太远了。”司机说了句：“加速冲过去！”说着已临火线，大队伊拉克炮兵正以排炮攻击伊朗，只见光天化日之下，伴随着大炮的吼叫，炮口喷出一串串火舌，炮弹从我们车顶嗖嗖飞过，震得人耳朵发麻。看着这一幕，我的心都快要跳到嗓子眼了；再看翻译，脸色苍白一声不吭。大约四五分钟后，我们终于驶离战场。回到巴格达，好几天仍心有余悸。

谋合作巧谈判项目终签约

历史上伊拉克是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1960 年代末石油的发现和开采使其迅速致富，大兴土木建设家园。但囿于自身能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和公共工程，都要借助外国技术和劳务来完成，从而在十多年间成为中东地区热门的国际承包市场。至 1980 年代中期，在伊的各国承包（材料、设备）商竟达上千家，外籍劳工过百万（当时伊拉克人口才 1200 万），竞争激烈揽活不易。那时，我国有中建、中水、路桥、石油等 8 家“中字头”的央企在伊经营业务，员工超过 2 万人，几占全国同期在外从事承包劳务工作总人数的一半。相对来看，CPECC 在这里项目不多且以劳务为主。我驻伊使馆认为，石油是伊国的经济命脉，中伊关系友好，CPECC 是中国石油的国家队，在这里应有更多作为；石油部也要求 CPECC 在伊加快发展，所以 CPECC 驻伊办拓展市场压力很大，而驻伊办 6 人中我是唯一的技术业务人员，翻译则是我的工作搭档。我的任务主要是联系伊拉克石油、住房等政府机构和他国在伊公司，搜集信息寻求合作，同时受命与伊石油建设总公司（SCOP）就油气田地面建设劳务合作进行洽谈，对手是该公司合同处长沙菲·凯米尔。

凯米尔先生时年 40 开外，早年留学苏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资深合同谈判专家，却是头一回和中国公司打交道，因此我不得不花许多时间费口舌地向他介绍情况，使他对我方有一定了解和信心后才转入合同磋商。合同磋商涉及技术和商务，细致而复杂，而凯米尔先生又是个对工作极其认真的人，往往一个问题要与他反复商谈多次才能解

决。起初，在劳务人员工作时间、薪酬和加班计酬、保险责任等方面，凯米尔提出要比照以往他们与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孟加拉等民间劳务机构和私人老板签订的合同条件来办，而这些条件大都压得很低且不合理。我当然不同意并据理力争，要求遵循国际惯例，强调中国劳务人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成建制派出的，不仅技术过硬，且组织纪律性强，能够严肃履约，故其合法地位和权益理应得到尊重。凯米尔被说服了，不再坚持他的一些不合理要求，同意给予中方人员相对较高的薪酬，承诺在住宿、医疗、节（假）日和工伤处理等方面，享有与伊拉克人同等待遇，工作满12个月后享有一个月的带薪休假，支持并提供炊（餐）具让中方自办伙食（这对我们很重要）。按伊拉克规定，外国为其提供技术服务的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必须出具学位证明，而我们却拿不出来。凯米尔对此大惑不解，他认为大学毕业有学位证明这很正常，还将他当年在莫斯科大学取得的工学硕士证书出示给我看。我只得耐心地向他解释，说明中国此前没有实行学位制度的历史原因；同时又告诉他，我们的工程师虽然没有学位证书，但经验与能力并不差，完全能够胜任工作。凯米尔想了想说，那就用他们的大学毕业文凭办理公证替代吧！这样，上面审查也好交代。一个棘手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在合同磋商的前两个月，我几乎每周都要与凯米尔晤面，有时一周二次。他很忙，办公室人来人往，不管几时只要我和翻译去了，他都热情接待。他说我们是中国的大公司，有实力。中国的“十一”国庆节前夕，CPECC驻伊办宴请法律顾问、清关代理等伊方人士，凯米尔开车前来赴宴。他穿一件大红衬衫配一条雪白长裤，样子显得有点

怪。从我们诧异的眼神里凯米尔似乎悟出了什么，不无得意地笑着说：“红色中国的国庆，我当然要穿红色衣服以示祝贺啊！”过后不久，凯米尔请我们办事处全员去他家做客（算是回谢），还让他老婆和两个女儿出面接待叙家常（这是很不一般的）。一天，我如约去会凯米尔，见他阴沉着脸似有心事，原来是战争使他们公司几个中青年人上了前线。谈完工作，凯米尔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战争打了五年，我们的领导人不想打了，伊朗却不干！张先生能不能请你们国家政府出面做做伊朗的工作，让他们别再打了；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的合同马上就签字。”听罢此言我心一惊，这个玩笑开得也太大太离谱了！我只好不动声色地点点头表示理解。凯米尔的这番话，代表了当时多数伊拉克人对战争的厌恶和对时局的不满，也表明他把我们当作朋友看待。

从6月中旬到11月下旬的五个多月里，我与凯米尔会见三十多次，经十几轮磋商、修改和完善，《雇用中国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合同》终于达成一致形成草本报批。伊方要求合同须有英、阿两种文本，但我们办事处没有阿语翻译，便请朋友、中水公司驻伊办阿语翻译杨芳涟女士（湖北沙市人，1950年代留学伊拉克，毕业于巴格达大学阿语专业，出国前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阿语组组长）帮忙。合同草本经伊拉克石油项目总机构批准后，签字仪式在伊石油建设总公司会议室举行，双方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人士悉数到场，还特请新华社驻巴格达记者吴毅宏采访拍照。签字后双方互致祝贺，合影留念，墙上悬挂的萨达姆总统标准像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凯米尔本来站在他的上司（总经理）旁边，见要拍照了，立马闪身走过来挤在我

和翻译之间，让人感到亲切友好（作为这项合同中伊双方主谈人员，这是我和他在一起的唯一照片）。我驻伊使馆经参处对这项合同的签订给予肯定，认为就价格水平、支付条件和人员待遇来看，是那时中国公司在伊签订的好合同之一。CPECC 和石油部也表示满意。合同生效两个月后，首批 70 名中国石油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即抵达东巴格达油田开始履约。



1985 年 11 月，中伊石油项目合同签字后双方人员合影。右二为张智海，右三为凯米尔先生。新华社记者吴毅宏摄

写报道为传扬英雄钻井队

10 月中旬，葛经理要我再去一趟巴士拉，除了南部油田机修、管道两个项目上的事务性工作外，特别要求我“把井队（的事迹）好好写一写”——这是新华社巴格达分社要的材料。他所说的井队，即在伊南部著名的祖拜尔油田承担打井的我石油钻井队。这支井队由四川石油管理局派出，在这里执行 CPECC 和伊国家石油公司签订的《技术援助服务合同》。这是中伊首次合作，也是中国石油钻井队在中东产油国第一次亮相，他们的工作具有开创性，其表现如何不仅关系到我方信誉和项目成败，还会影响到后续市场业务，因而备受国内外尤其是我国石油部和驻伊使馆的关注与重视。

去巴士拉之前，我应约到位于曼苏尔阿德努斯区 611 小区 5 巷 8 号的新华社巴格达分社，聆听分社社长、首席记者尹崇敬先生的意见。尹是 1944 年参加革命、战地记者出身的老同志，新华社中东问题专家，

说起来还是我的老师，四年前在石油部国际承包工程讲习班为我们讲过课，来巴格达工作相逢，彼此都很高兴。尹社长说：“前不久我看了《国际经贸消息》头版头条你写的《我石油钻井队在伊拉克旗开得胜》的报道，把井队来伊半年取得的成绩和伊方的赞扬都写出来了，很好。但《国际经贸消息》只是外经贸部系统的一张专业小报，影响有限；如由新华社记者采写报道，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分社只有三个人，这阵子事多忙不过来，听说你一直坚持业余写作，笔头也不错，所以我与你们办事处葛经理商量，由你去井队采写，待下个月他们打成第三口井时形成两稿——一是动态新闻稿，供新华电讯用；二是工作通讯稿，供《经济参考》刊登。”他还就两稿的不同写法作了点拨。尹社长的指导和鼓励，让我对完成这项任务更有信心。

三下巴斯拉，来到祖拜尔油田中国石油钻井队营地，蒋祖光总领队为我在员工宿舍（活动板房）里安排了一间办公室（兼任

宿)。蒋总“文革”刚开始那年毕业于西南石油学院，乃石油钻井技术专家，出国前是四川石油管理局川南矿区的一名大队长，他很欢迎我的到来。机修、管道项目离此不远，我先去那里把问题和清关事务处理完，然后在井队沉下来，一门心思做采访。蒋总告诉我，第一次带队出国来伊拉克打井，事先有两个没想到：一没想到井队员工的觉悟这么高，工作这么出色；二没想到在国外搞劳务，学问还挺多。井队56个人由四川局下面的5个矿区和技校等8个单位选派，3月下旬从“天府之国”来到这茫茫的荒漠。这里临近战争前线，几乎天天听到炮击声，不时还有军机轰鸣从头顶飞过。春天狂风不息沙尘飞扬，夏日骄阳似火酷热难耐（中午地面温度一般都在70℃以上）。肉类多蔬菜少，这对四川人来说尤难忍受。钻井用的是从未见过的苏制DGU-4000老旧钻机，又不熟悉地质情况，一个作业班在国内配十二三人，而这里只有七八人。尽管环境恶劣生活艰苦，生产困难重重，但大家团结一心克难奋进，第一口设计3350米、实钻3369米的深井，仅用62天打成，比伊方下达计划时间提前了24天，且检测质量全优。然而伊方并不满意，还向CPECC驻伊办“告状”，说我们工作不主动，缺经验，翻译不合格，扬言要处罚。怎么回事？经“反省”查找原因，又与伊方沟通，原来是我们对合同条款“中方须在伊方的指令下进行工作”的理解机械而片面，以为一举一动任何事情都要伊方发话才能干，这就让伊方觉得我们很懈怠；我们的一个翻译，一次与伊方人员交流不畅，还当面揭短说人家语法不对、发音不准，弄得对方有失颜面、大为光火。原因找到了，立即整改，很快与伊方关系大为改善。不到五个月，我们打成两口优质深井，加上正

在钻进的第三口井，累计进尺破万米，多次刷新这个地区的钻井记录，不仅伊方大加赞赏，也令同在这里打井的苏联、波兰、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国的同行们刮目相看。

这天，为听取意见和洽商合同延期事宜，在蒋总陪同下，我以CPECC代表身份会见了南部油田钻井部经理阿德尔。阿德尔先生对我说：“贵国井队在这里干得很好。事实表明，我们最初有些误会，担心和疑虑也是多余的。由于你们井队的出色表现，我们正在研究延长合同一年问题。”

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蒋祖光，井队在这里干得这样好，原因何在？

蒋总说，主要是信念的支撑。大家出国前立下誓言，创立信誉为国争光，这可不是口号。多国井队同场竞技，你没有一流的技术和管理，没有高速、优质和安全，信誉何来？井队的每个人都清楚，我们是代表全国800多支井队来这里工作的，干砸了，伊拉克人和他国同行不会说你井队不行，而是说中国人不行；要是这样，回去怎向领导交代？怎有脸见父老乡亲？所以哪怕再苦再累再难，也不能退缩，这就是原动力！

在井队的上十天里，组织座谈、个别交流、跟班（上井场）劳动，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个英雄群体平凡而非凡的事迹和业绩所感动，写下了两万多字的采访笔记。月底回到巴格达，按尹社长的意图写出两稿，向他“交卷”。

11月15日，即我井队打成第三口井的次日，新华社播发了署名记者尹崇敬的《中国向中东派遣的第一支石油钻井队提前完成任务》的新闻。当晚8时刚过，尹社长从巴格达分社打来电话，告诉我在这里收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关于这篇新闻的广播（我想这就是当初尹说的第一篇稿“动

态新闻”），他还对我的“支持与合作”表示感谢。

不久，新华社《经济参考》刊登了由尹社长和我共同署名的同一题材的工作通讯（我想这就是当初尹说的第二篇稿子）。

我想到，英雄井队来自四川，应该让他们的亲人和家乡人民对其业绩有所了解，于是又给《四川日报》投稿，该报即以“巴格达航讯”登出。

再后来，权威期刊《国际经济合作》（国内外发行）在“来自海外的报告”专栏，发表了我所写深度报道中国石油钻井队在伊拉克工作情况的特写《走向世界的中国石油工人》。

居异国思故乡万里寄家书

巴格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名城，又是西亚文化、商贸中心和交通枢纽，其城市之美之繁华难以尽述。1980年代中期的巴格达，虽然边境战事不时吃紧，电视里从早到晚不停地播放前线战况，播放武装部队总司令萨达姆视察战地慰问将士的报道，伊朗在半年内打来的13枚导弹几乎都落在市区1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但平日里依然一派升平景象，百姓依然丰衣足食生活安逸。巴格达是个开放度很高的城市，来这里旅游、经商、学习的外国人很多，各种物资主要依赖进口，市场活跃供应充足。CPECC驻伊办在市中心底格里斯河附近，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偶尔组织郊游，驱

车去巴比伦、萨玛拉等名胜古迹观光，还有机会参加我驻伊使馆和伊方举办的活动，生活充实而愉快。

6月末的一天，我们办事处来了一伙“不速之客”，中水公司摩苏尔项目上的13名员工，工作满两年将于第二天晚上回国，来我们办事处借宿中转。两年前他们来伊时已是半夜，出了萨达姆·侯赛因机场便连夜乘车去了几百公里外的项目驻地，甚至未能瞅一眼巴格达是什么模样。为使他们回国前能在首都逛逛、买买东西，领导特别关照，提前一天将他们送来巴格达。我们办事处没有多余床位，只好在接待室和楼道里打地铺，就是这样他们也很乐意。要回国了，个个脱旧换新，心情忒好，抓紧时间逛街拍照。一般工人在这里干满两年，赚的钱都能买到外汇免税商品彩电、冰箱等“四大件”和收录机、照相机等“四小件”，在那时这是很让人羡慕的。然而一位中年工人师傅却悄悄地对我说：“这里哪怕是有一座金山，我也绝不再来！气候恶劣工作艰苦倒不怕，



1985年9月，张智海与伊拉克小朋友在巴格达底格里斯河畔留影，背景为《天方夜谭·国王听书》雕塑

就是太想家，叫人受不了。”这使我想起南部油田机修项目上有几名工人技术很好，听伊方人士放言合同到期后要留他们继续干，他们怕到时不能回国，竟有意吊儿郎当不好好干活。

的确，长期在国外工作的人，对祖国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是未经历者体会不到的；而家人对工作在海外的亲人的牵挂，尤其是健康与安全的担忧，也是难以言表的。30多年前既无互联网也无移动电话，国内外联系主要靠鸿雁传书。这样，分别在国内外的家人能够及时收到来信，就是各自最大最好的安慰了。1985年时因我住在巴格达，通常是写就家信贴上邮票（出国时带来的），送去我驻伊使馆，由外交部信使队（每周一次）带回北京投邮就得了；武汉家人的来信，也是寄到北京外交部信使队，由信使捎来巴格达，我们再去使馆取回。我到巴格达之后即寄信家里报平安，转眼快一个月了却迟迟不见家里来信，心里很是着急。又过了几天，终于收到妻子的武汉来信，还附上了她和女儿在黄鹤楼的照片，让我欣喜不已。此时（1985年6月），黄鹤楼刚建成开放，看来她是特意带孩子去那里拍照寄来巴格达的。这封信从武汉寄出到达我手里，七天时间行程万里，也算是神速了。

当时两伊之战打得难解难分，巴格达一直是伊朗导弹袭击的目标。为使家人放心，我每隔十天半月就给家里写封信。一天我突发奇想，欲尝试走一趟国际邮路，让家人见识一下国际邮件，于是我来到住地附近的瓦赫达邮局，花200菲（约合人民币0.6元）买一张邮票将信寄出。巧得很！这是一张伊国为纪念萨达姆总统48岁生日而发行的特种邮票。邮票上，戎装冠带面带微笑的萨达姆被国旗和鲜花簇拥，设计印制十分精美，

上面还盖有巴格达瓦赫达邮局的邮戳，保存至今竟成极其珍稀之物。

结束巴格达的工作回国前，CPECC驻伊办专门为我写了鉴定材料，积极评价我的工作；还开了欢送会，给我留下念想。回国不久，鉴于我的一贯表现，尤其是在巴格达的出色工作，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解决与家人长达18年两地分居的困难，我致信中共武汉市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求助，经其牵线联络，有多家单位同意接收我。经权衡择定，最终调入了武汉市城建委。过后，组织人事部门的一位负责人私下对我说，武汉城建战线工程技术人员成千上万，但像你这样从基层（施工队）干到高层（石油部），从国内干到国外，有理论有实践，又有较高文字水平的却不多，所以领导很看重。一年后，为适应城建领域对外开放新形势需要，市编委同意城建委设置对外经济管理处，负责城建系统“三外”（外资、外经、外事）管理，我被任命为负责人。据悉，在巴格达的工作经历，是我获此任命的重要原因。我在这个岗位上工作的10年（1988~1998年），正是武汉城市建设以“开放先导”为指引，利用外资加快发展，外经合作卓有成效，对外交流十分活跃的10年。我只是做了一些应做的工作，而组织上却给了我许多荣誉，先后被评为市城建战线建功立业共产党员标兵、市优秀共产党员、首届武汉市模范公务员（共10人）。

（张智海：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资深会员，武汉市城建委退休干部）

我的民国故事——刘绪贻回忆录（十七）

◇ 刘绪贻（口述） 余坦坦（整理）

除美国师长外，还有两位关心过我的师长也应提一提。一位是当时在芝加哥大学讲授《中国古文字学》的清华教授陈梦家。由于他夫人赵萝蕤当时也在芝加哥大学进修，他们在当地有个家。他虽是位著名诗人和考古学家，但为人热情，不时邀请我们这些在芝加哥大学的清华同学到他家聚会，因而相识。1947年上半年，他了解到我因未按照陈达教授要求重点攻读社会统计学而未被清华聘请时，主动地多次为我向国内著名大学联系工作。另一位是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孙本文教授。他当时是中国社会学学会主要负责人，虽然我们素不相识，但他接到我要求介绍工作的信件后，十分信任和关注，使得广州中山大学和昆明的云南大学都愿意聘我去任教并兼任社会学系主任。不过后来我因家在武汉，而且作为

湖北省公费留学生，有义务留在湖北工作，所以选择了武汉大学。

在同学中，最使我怀念的是马尔科姆·柏森。他在芝加哥大学本科学俄文，20岁出头，胖胖的，戴副黑框眼镜，显得憨厚，说一口标准的中国普通话。应该说，他是在日常接触中逐渐了解到我当时的思想状况后主动接近我的。他不大谈自己，即使谈也很简略。我只知道他童年住在波士顿，父母是犹太人，已离异。他此前曾到过中国解放区，说是从事救济工作。他喜欢中国音乐，也爱谈中国文化。他从来不谩骂美国大资本家与中国国民党人，但他的言谈举止使我清楚地意识到他与他们不同类。他似乎没多向我正面宣传中国共产党，但他时常有意无意地带给我某些中共人士写的书和办的杂志。我仍记得清的有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

和香港出版的《群众》。是否有《新民主主义论》，我已记忆模糊。他不强求我立即信任中国共产党，但他曾深情地向我娓娓叙述他在山西遇见的一位共产党员小学校长艰苦办学的故事，并评论说，从这位小学校长来看，中国共产党人不是争权夺利的，是真正为人民办事的。经过和柏森较长时期的接触，我渐渐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觉得它也许是一支可以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富强道路的政治力量。

当时，虽然大多数美国人表面上对中国学生是友好的，但有的人骨子里免不了种族优越感，显得冷漠。柏森和我的交往则不同，表面上虽然淡如水，但骨子里却富有热情，没有杂念。他主动要求阅读我的硕士论文稿，并声明在必要时做些文字润色，绝口不谈报酬（其他美国同学为中国学生润色论文文字往往是要报酬的）。我怀疑柏森也许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但他说相信一种理想是一回事，参加一个政党又是一回事，因此，我始终不了解他的真实身份。1946年以后，柏森再没有回到芝加哥大学。1947年我回国时，无缘和他道别。但我回国以后的生活道路，是和他的交往密切相关的。解放以后，因中美断交，我未能和他联系。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抄走了他的通信地址，此后我一再拜托美国进步人士打听他的消息，却杳无音信。人世沧桑，他还健在吗？或者，他生活得怎样？是否仍在追求理想呢？老来情怀，怀念故人愈切，特别是忆起我当时没有答应和他共同从事研究工作，尤感歉疚，往往在月明人静之时，不禁遥望大洋彼岸，轻轻呼唤：“柏森，我多么希望再见到你呵！”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另一位好友是来自加拿大的女同学弗洛伦丝·爱德华兹（Florence Edwards）。初相识时，因为她

身材高挑，容貌端正，衣著华丽，举止稳重，我以为她是大家闺秀，不易接近。实际上，她来自中产阶级家庭，思想开明，心境豁达，容易相处。我们之间交往，开始时大都是她采取主动。后来，因为我初到美国上课时笔记不全，总是借她的笔记抄，共同研讨课程内容，关系日益亲近，逐渐发展到一同聊天，一同就餐；至于一同游公园、上中餐馆，则是她暗示的结果。比如1946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周末，阳光明媚，景色撩人，我们共进午餐后，她对我说：“天气恼人，今天下午我真不想坐在宿舍看书，想到公园里去晒太阳。”原来，当时芝加哥人、特别是青年男女有个习惯，一到这种时候，只要天气好，便相约到密歇根湖畔的公园草地上去晒太阳，拥抱接吻，旁若无人。我听了她的暗示后，回宿舍取一毛毯，和她一起到公园里去晒太阳。但是我们没有拥抱接吻。我不知她是否感到失望，因为她说过她很喜欢我，我们已经到了互诉一般隐私的程度。

她早我一年获得硕士学位，1946年暑假后到纽约市附近的一所学校任教。我们鱼雁常通，互诉别情。1947年春夏间，我因想在联合国找个工作干一阵赚点钱再回国，又一次到纽约，她曾请我共进晚餐。回校后接到她的信，她问我那天晚餐后为什么不请她同游纽约的中央公园。要知道，纽约的中央公园正是美国恋人们的夜游圣地呵！

1947年一别，韶华荏苒，忽忽37年未通音信。1984年，我应美国与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邀请赴美讲学、访友、做研究，12月路过芝加哥大学时，住在我和她当年一同住过的国际大厦（International House，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捐建的，旨在使美国学生和各国留学生住在一个宿舍里，以便促进彼此之间的友谊与了解）里。大厦经理问我是否还

记得当时的一些同学，我提到她，这位经理很热心，立即从大厦保存的有关名册中找到了她的通讯处和电话。当我们在电话里互诉近40年来离情别绪时，那股高兴劲真是难以形容。此后，我逐渐了解到，她后来嫁给了一位美国学者，作为家庭妇女养育了5个孩子后，又回到学校念了一个博士学位，1984年时，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回国以后，我设法邀请她到武汉大学来讲学。1988年9月她来时，我已75岁，她65岁。她热烈地拥抱我、吻我，我却未敢做出同样热烈的回应。她在我校时，我们见面一般是交流学术思想。除向她了解当时美国社会学研究动态和她的研究工作外，我还将她的一篇文章《亲职社会学》译成中文，发表在武汉市《社科信息》1988年第5期上。她很关心我的学术思想和著作，但她不懂中文，只好由我介绍，不过她大都是同意的。有几次我请她来家做客。一次她告诉我，她已和丈夫分居，并且流下了眼泪；又一次她问我，1947年在一次信中我是否有意向她求婚，我当时的确不曾有那种思想感情，也坦率地告诉了她。她说那样也好，两个人只要有很深的友谊，有了感情，也不一定要结婚。讲学期满后，她一再邀请我陪她到中国各风景名胜区游览，而且因为知道中国教授工资菲薄，愿意独自承担费用。我因当时写作任务紧张，只答应陪她游览黄山和杭州。到了杭州，我大儿子刘南请她做客，招待殷勤，她很感动。她回到美国后还是频频来信，情意绵绵地回忆这一段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愉快经历，并在署名前加了3个英文缩写字母：Y. A. W. 我百思不得其解，经一再询问，她才答全文是：Your American wife（你的美国妻子）。后来，当她了解到我的大儿子是个既有天赋又有抱负的学人时，还真的

扮演了“妈妈”的角色：不独积极帮助他获得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进修的奖学金，还借给他赴美旅费，在家里殷勤地招待了他。

1990年，弗洛伦丝升任为正教授。1992年5月退休，不久获得终身教授荣誉称号，并和学校有约，每年5月，只要她愿意，还可以开一门课。她利用此机会进行了一种新的尝试，即开展电视教学，大大扩展了她的桃李门墙。她还被邀请竞选过州参议员，但未成功。2004年以后，再未听到她的消息，我衷心地祝她健康长寿。

（待续）

汉口民革组织的建立及其地下活动略记

◇ 张梦圆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是追梦的领导核心和带头人，民革作为参政党之一，自始至终扮演着“助梦人”的角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直是包括武汉市民革在内的民革前辈先贤不懈追求的目标。今天我将回望的是汉口民革地下组织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宴会

1946年5月28日，王葆真（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在重庆给程一新（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汉口地下组织负责人，汉口精诚新闻社社长）寄来一封航空信，大意是他们一行人路过武汉打算住宿一夜，乘此机会与武汉的同志们见面谈一谈。当时程一新把这封信给容景芳（国民党退役中将）看了，容景芳很是高兴，并用他的名义，

分别邀约他的旧部——副师长朱旭东、参谋长马骥、团长朱汉涛以及武汉知名人士、同盟会会员、国民党一大委员祝润湘，同盟会会员、省参议员付慧初、陈次中，《武汉日报》的陈云五，《新湖北日报》的李经世、汪以南、汪世鏊（均为国民党少将，原为李济深旧部），工商界的韩万青、范奔公共30余人待王葆真一行来汉时集体相迎。

1946年6月1日傍晚7点多，由重庆开往南京的民联轮船路过汉口，船上乘客多为民主人士，其中有李济深夫妇，冯玉祥李德全夫妇，王葆真和女儿王宠惠，徐悲鸿、褚辅成、鹿钟麟、张之江、谭平山、侯外庐、田竺僧。

李济深、王葆真、余确（李济深的随从秘书）等在程一新陪同下，乘车来到汉口交通银行会议室参加集会宴请。欢迎会由容景芳主持，他说：“今晚本党同志，各界代表借李任公（李济深字任潮）、王卓老（王葆真字卓山）路经汉口，并蒙光临之际，欢聚一堂，我代表武汉同志向两

公致以热烈欢迎。任公、卓老皆是党国元老，孙中山先生忠实信徒，德高望重，敬请任公、卓老就当今之局势，同志之任务，指教吾等，以便遵循。”

在座的一次又一次鼓掌欢迎，李济深致词：“八年抗战，总算取得了胜利，日本投降了，我国百姓吃战争的苦头太深了，今后再不能有战争……要休养生息，大家共同把国家建设好，把科学、教育搞好，把工人、农民生活搞好，只有和平，不打内战，才能安居乐业，老百姓才能有好日子，工商业者才能有发展前途，帝国主义才不敢欺侮我们，国家才有出路，民族才有希望。大家要以主人翁自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恶者恶之，要肩负起广为宣传责任，要真正达到和平，去掉东亚病夫的丑名，和为贵，要时时揭露假和平、真战争的阴谋……”

待散会大家纷纷离去后，王葆真和余确又与汉口民革几位骨干代表密谈到夜深，含而稍露地说：你们要邀约志同道合的人，组织起来，在李任公的领导下，要求民主，反对独裁，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平等，反对压迫，要求生存，反对屠杀，要有信心，只有奋斗，前途才是光明的等等。他们又再再说：以后要多联系，互通音讯，不要失掉联络。

汉口民革地下组织的建立

1945年10月，谭平山、陈铭枢等在重庆组建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6年，李济深、蔡廷锴等在广州组建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这两个组织在全国重要城市都暗中积极发展组织。

1、民促首先建立汉口支会。1946年3月，程一新在重庆，经民促中央常委王葆真的介绍，加入了民促组织。不久后，王葆真命程一新先期返回汉口，在汉口物色志同道合的人，酝酿建立民促分支机构。程一新回到汉口后，恢复了由他在抗战前所创办的精诚新闻社，并以此为掩护，开展社会联系。1947年春，王葆真由北京飞往汉口，代表民促中央向汉口有关同志正式宣布成立民促汉口支会，以容景芳为召集人，以祝润湘、程一新、曹天铎、付盐梅、付慧初、范奔公、吴汝尊等为理事。

2、民联也建立了汉口支会。民联汉口支会也成立于1947年，领导成员有田竺僧、晏道刚等。其他成员有曹美成、肖连城、陈中介、陈绍林、马骥等。

3、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在香港召开民革代表大会。1947年11月，在李济深、何香凝等人的发起下，原国民党民主派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在香港举办了代表大会。程一新和曹天铎（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汉口地下组织负责人）都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选举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王葆真等16人为常委。曹天铎当选为执行委员，程一新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

4、民革建立汉口分部筹委会。1948年1月17日，民革中央召开了第一届第三次中常会，由李济深主席主持。出席人有王葆真、蔡廷锴、朱蕴山、陈劭先、张文、何香凝、陈其瑗、谭平山、何公敢等。会议第四项议程即讨论汉口成立民革组织。当时的记录是：主席提议湖北汉口市拟任容景芳、付慧初、祝润湘、余公朴、童少阳、李翊东为筹备委员，并以容景芳为主任委员，请公决案。决议：通过。不久后，民革汉口地下组

织“民革汉口市分部筹备委员会”就正式成立了。原汉口民促、民联会员，基本上都是汉口民革成员。

汉口民联、民促、民革在武汉解放前夕的地下工作

1、利用精诚新闻社这个合法机构从事地下活动。

精诚新闻社是一个开展新闻业务的机构，同时也是进行民革活动的掩护机构。社址开始设在汉口黄兴路协隆里3号，后迁至扬子街新德里4号，再后来迁至天津路联怡里31号。秘密印刷所，则设在汉口民主一街111印字馆内。为了地下工作同志的安全，无关人员只能接触公开的社址。

精诚新闻社利用公开身份，除掩护部分民联、民促、民革同志外，一些地下共产党员和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通过担任精诚新闻社记者、特约记者、编辑、编辑主任、副主任、驻某地特派员、驻某地办事处主任等职，成功实现了隐蔽。如，中共江汉城工部武汉七七组负责人陈树藩就是精诚新闻社的编辑主任，胡旭、田润生、田孝杰、吴正东、吴平等均为中共地下党员，王文灿、王耀庭、均为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

为了方便地下工作同志出入解放区，精诚新闻社接受中共地下党胡旭、陈树藩建议，在麻城宋埠（靠近解放区的地方）设立汉口精诚新闻社办事处，由胡旭负责。武昌、汉阳也设有办事处，以便碰头见面，休息洽谈。汉口精诚新闻社印有社通行证、服务证和证章，发放人员范围有由香港或海外远道来汉转入中原解放区开会的中共同志及其他民主人士，也有由解放区过来要到其他地方去的同志。“三证”大部分由中共江汉城

工部武汉七七组帮助分发，也有小部分由精诚新闻社直接分发。

精诚新闻社还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他们确立了办报宗旨：不发表反对共产党的消息，不发表国民党反动的军事消息，只发社会上的一般新闻稿以及秘密编写和翻印民联、民促、民革地下活动声明、宣言、行动纲领和告武汉市人民书等。为此，社长程一新与编辑主任陈树藩还订立了文字条约。

1949年4月28日，民革汉口分会秘密油印了《告武汉同胞书》，根据电话簿上的地点寄发各处，原文如下：

亲爱的同胞们：

武汉快要解放了，同胞们都怀着高兴愉快的心情，欢欣鼓舞着来迎接空前未有的新局面，这显示着蒋政权，已为全民所共弃，且必为民主革命力量所彻底摧毁，而中华民族也就走上富强康乐的大道。

抗战胜利，武汉从敌人铁蹄下翻起身来，但不久即被蒋的反动政权又加上了极残酷的枷锁。三年以来，我们处在反动政府淫威之下，无数的膏血，被他们吸去了，国家民族的利益被他们出卖了，向美帝国主义者换来飞机枪炮，来残杀我们的同胞，还自造民意，演出他的总统美梦，全国人民的血流，变成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私产。武汉同胞，当不能例外，更加上制造六一惨案、景明大楼帝国主义分子强奸妇女案等，国民党、反动派感到末日来临，妄想死灰复燃，尚图作最后的挣扎，而且毫无人性地大肆破坏武汉许多的人民生命财产和建设，如水塔、电厂、纱场、电话电报、码头轮船。我们要坚决不准他们搬迁和炸毁，这是大家的命脉，每个同胞都有责任保护，我们应该一致奋起，向反动派蒋系桂系势力作最后的打击，加速我们人民革命的成功。

现在已获得必胜的把握，今后更有光荣的前途。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是解放人民痛苦，为人民安全服务的，希望我全体同胞携起手来，安全生产，共同维护社会秩序，协助人民解放军完成解放全武汉的工作。

最后我们高呼：

彻底肃清蒋系桂系的反动势力！

彻底摧毁一切反动的军队！

此文稿是与中共江汉城工部武汉七七组共同研究拟定的，当时世光小学校长李正诚、教导主任韩行健、教员肖力真和雷醒华兄妹等人贴足邮票，在离油印厂地较远的邮筒分散寄发出去的。此文钢版是田孝杰（中共地下党员）刻制的。

武汉解放的当天，民革、民联、民促在武汉地区地下组织公开迎接武汉解放共同发表联合宣言《告全国同胞书》。全文登载在汉口1949年5月18日的《大刚报》《正义报》《民风报》《武汉时报》等报纸上。

此外，精诚新闻社利用自己机构的合法性，联络在汉口的20多家私营新闻通讯社组成联谊会，让其他通讯社发表一些精诚新闻社不便发表的新闻，如，武大“六一惨案”，在景明大楼、陆军医院发生的帝国主义分子侮辱妇女案等。

2、做好策反工作，配合解放军渡江。

根据上级提示，汉口民革每月或两个月分别密邀在汉的晏道刚（曾任国民党中将）、付盐梅（曾任国民党少将）、马骥（曾任国民党少将）等，大半在铭新街18号世界红十字会汉口分会会议室，有时在岳飞街23号容景芳家，也有时在武昌银元局街马骥家里，商谈策反国民党军队事宜，强调策反之事意义重大，非同小可，要见机行事。最终策反工作取得了成效。

1948年8月，付盐梅利用旧部胡人伟、

徐崇训进行活动并召集已遣散的国民党官兵组织部队，成功策反礼山县县长胡人伟、麻城县县长占剑锋，还利用谌杰、樊子芳策反了夏斗寅、吴良琛。

1949年春，马骥同方克猷、徐凌云等赴湖北广水，策动应山县县长周伯勋率县保安两大队归并张轸部于1949年5月15日晚在武昌金口镇参加起义。

原国民党华中剿总副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张轸，见国民党大势已去，自己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经常受排挤，内心想脱离奈无机可乘，便密派驻汉办事处主任刘万斯及已退職河南省潢川县警察局局长罗英才，两次找容景芳转请民革中央李济深主席打通与解放军的关系。1949年5月15日，白崇禧部队在武汉溃退时，张轸率领该部以及一二八军军长辛少亭、一二七军副军长、独立第三师师长张继烈、张玉龙共4.5万官兵在武昌金口防地起义。

策反汉口市市长晏勋甫留汉是当时的一项重要任务。武汉解放前夕，白崇禧的部属鲁道源（武汉守备司令）威逼晏勋甫，要他将家眷搬迁到香港。当时中共地下组织希望一直在晏勋甫左右的民革地下同志晏道刚（晏勋甫的叔叔）、林厚周等留下晏勋甫，同时林厚周暗地里与住在林厚周汉川老家的中共江汉城工部部长邱肱良挂上了钩，一起做留晏勋甫的工作。1949年5月15日，鲁道源派兵到处找晏勋甫要其一道逃走，晏道刚、林厚周等当面再三希望晏勋甫留下，然而晏勋甫却担心他的家眷在香港无钱用，留下来又怕共产党算他的老账。林厚周斩钉截铁地说：你的家眷在香港无钱用那好办，我写信到香港就近拨款三千银元。当着晏的面写好信并寄出。同时，林厚周等假借晏勋甫汉口市长的名义与口气，分别打电话给市

属各局电厂、水厂照常办公，不要停电停水，要安下心来，听候解放军来接管，千万不要破坏。当晚大家通宵未眠，共度汉口“真空”之夜，等到第二天解放军进入了汉口市区，到此才算把晏勋甫留了下来，向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了一个交待。

3、保护重要设备设施，维护武汉真空期治安。

1949年5月15日，国民党军溃逃的当晚，炮声隆隆。为着防范宵小之徒的扰乱和国民党残兵的抢劫，更为着策应人民解放军的顺利接收，民革汉口分会负责人容景芳与中共地下工作同志李平成商议之后，发动汉口市全体会员担当起全市的治安责任，上自硚口，下至三元里，每个区域都有民革同志担任警戒。为了形势的需要，还发动人民自卫队的武装力量来维持真空期的局面。

吴泽善是汉口精诚新闻社派驻武昌徐家棚的特约记者，还担任当地保长，暗地里他还参加了由王文灿领导的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武汉解放前夕，他在当时中共城工部地下党组织具体领导下，积极参加“迎接护产”行动，保护了武昌徐家棚一带机车、厂房、机油、办公大楼及水上船只。他们还亲自缴了当地袁剑平的武装和电台，并联系进入城市的解放军部队，缴了盘踞在徐家棚附近的陈家河一带的李开元地痞土匪武装，圆满地完成了地下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

精诚新闻社特约记者、民革成员潘忠尧、潘大祥、项子云等，将汉口万安巷和小新码头趸船、跳板等轮船码头设备，有意沉于河中，敌人溃逃后才打捞出水，避免敌特破坏。此外，董斌、董秋枫、樊明浑等均利用精诚新闻社的身份，一方面公开采访或编写新闻稿件，供给汉口总社，审编后再转送汉口各报社摘用；另一方面，暗地里在中共

地下组织成员的辅导下，帮助采购、输送解放区急需的药品、通讯器材等，受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表扬。

1949年5月18日，汉口民革召集人容景芳以民革鄂、豫、湘分会主任委员的名义，租用汉口新生花园召开新闻发布会，除了对人民解放军解放武汉表示欢迎之外，希望全体市民一致拥护孙中山先生制订的三大政策，支援人民解放军向江南进军，解放全中国。容景芳还当面保证，1949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联署、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形式公布的“入城约法八章”是要百分之百地实行的。

武汉解放前夕，有很多民革成员为了武汉的解放默默奉献，甚至付出了生命。1947年8月，国民党特务突然将精诚新闻社秘书兼总务主任袁竞抓走。袁竞的公开工作是处理本社日常事务，此外还担任地下组织的译电员、机要员。敌特秘密把他抓去盘问拷打，要他检举揭发地下活动情况，他始终宁死不屈。1949年5月8日深夜，敌特将汉口沿河大道咸宁码头吕测中住宅包围，将他抓去严刑拷打，要他供出程一新的活动情况及去向。吕测中守口如瓶，直到5月15日国民党军溃退，才免于死。1949年4月，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陈大中，将住在汉口汉景街的民革地下工作者何玉山、何恒山、倪子英、王子恒4人捕去，直到武汉解放多年后他们仍都生死不明。像他们一样，于1949年被捕，直到武汉解放多年后仍下落不明的民革地下党员还有曹天铎、江国瑞、孙子和、徐人立等。

（张梦圆：武汉市民革机关宣传部干部）

鄂东名医刘楚樵

◇ 王腊波

刘楚樵（1881~1972年），字昌楹，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邾城街刘集刘三屋湾人，出生世代伤科医家。清乾隆年间，居住在刘集刘三屋湾的刘本祥，收留了河南来的江湖郎中戴金花。戴将自己的绝技正骨医术传授给刘本祥。刘开始正骨行医，创“刘三屋刘氏骨伤疗法”。传至第六代刘楚樵，擅长以杉树皮制作小夹板固定骨折部位、脱臼复位、开放性骨折的治疗以及推拿按摩等技术，并佐以中药（秘方）内服，疗效显著，登门求治和车轿接诊者甚多。在黄冈、麻城、浠水、红安、黄陂、武汉、河南等地颇有声誉，有“接骨斗榫，妙手回春”“画佛佬”等美称。

（一）

刘楚樵7岁入私塾，在刘三屋学堂念书不足5年，即师从于刘首山先生，14岁随其父刘子厚学医。不久父亲因病去世。当时从医稀世，伤患凡多，有的因失治致残，有的因误治遗疾。为减轻伤患者痛苦，刘楚樵开始精专治伤的奥秘。他勤求古训，博采

众方，阅读了大量有关骨伤科方面的历史文献，如唐代蔺道人编著的我国第一部伤科学著作《仙授理伤续断秘方》、元代危亦林所著的《世医得效方》、明代薛己的《正体类要》、清代吴谦的《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顾世澄的《疡医大全》、钱秀昌的《伤科补要》、赵竹泉的《伤科大成》、胡廷光编著的《伤科汇纂》等书籍。学习中，他取名家学派之长，思求经旨，演其所知，思古而不泥古，学理论运用于临床。经过多年苦心孤诣的摸索和钻研，终于在理论上为后来骨伤科的研究和发现打开了通道。

为积累丰富的临床经验，他对古医书上的诊治方案大胆加以演绎和利用，并敢于突破前人的一些既定框框，融会贯通于实践之中。刘楚樵初为患者治伤的那一年，有次为给一位病患缝合伤口，绞尽脑汁未能使其弥合，冥思苦想，仍不得法，无奈只得先回卧房蒙头大睡。昏睡之中，忽见先父厉声呵斥，并仙授用胡琴线缝补伤口。刘楚樵惊醒后，知道是南柯一梦，但梦中所见使他茅塞顿开。他经过认真思考，恍然大悟，觉得用

胡琴线可优于其他针线，于是大胆采用，果然收到奇效。由于刘楚樵专心致志地致力于骨伤科之道，把理论结合到临床实践之中，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终于积累了一套完整的治伤经验：一是早期准确的手法复位，二是准确运用小夹板固定，三是辨证用药内服外敷，四是适时地指导伤患者练功。尤其是对正骨手法颇有造诣，例如“刚柔相济，阳中稳阴，阴中稳阳，力中运法，法中运力，巧贯其中，迎随顺逆，随手旋转”，使患者无觉地复位。更有趣的是坚持用杉树皮制作小夹板治疗骨折，简便易行，治疗期短，治愈率高，并发症少，减少患者痛苦，这个古老而具有民族传统的骨折外固定法在刘楚樵的医术活动中得到了灵活的运用和发展，成为其后代骨伤科方面的优治法。

（二）

刘楚樵医成名就之后，慕名前来求诊者络绎不绝。他对任何伤患求诊者都是满腔热情积极施治，在医疗过程中精益求精，为不少疑难病患者解除了痛苦。

医书上有“折肱数次皆可治，截瘫十患九难痊”之说。刘楚樵曾记载了一个病例，正反映了他高超的医技。1937年盛夏之季，麻城县张家洲一汪氏妇，因雨天行走崎岖山道，不慎滑倒，摔落崖下十余米。患妇当时昏迷，苏醒后双手双脚麻木不仁，继而不能活动以至大小便失禁（现代医学称之为高位截瘫），患者家属遂请当地民间郎中医治一年之久，不见好转。翌年转请刘楚樵就诊，发现颈椎关节脱位，形体虚羸，精神疲惫，一副有气无力之状。刘楚樵观其形，察其病，辨证施治，采用综合治疗的方法。内服中药，实其脾，滋补肾，血有先化之源，筋骨受血

濡之；继之采用摸、接、端、提、推、拿、按、摩八种手法，选择相应的经络穴位，散郁法之肿；最后结合悬吊复位法（现代医学称之为牵引复位法）诊治。经过刘楚樵精心治疗，二旬之后患者精神开始好转，一月竟能起床站立，二月后可慢慢散步。随后继续指导患者练功，不到三月病人恢复正常。这样，刘楚樵凭着他精湛的医术、为人的赤心，使处于绝望的伤患妇人得救。她和她丈夫为此泪如泉涌，硬是将一匹白色骏马赠送给刘楚樵以表谢忱。

1970年秋，刘楚樵已是耄耋之年。红安八里桥乡拾来一位陈旧性股骨骨折的男孩，病人家属一见到刘楚樵就泪流满面地介绍：“孩子因玩耍将左腿股骨跌断，寻访本地一些医生诊治半年之久，至今仍无好转，现慕名而来，请救孩子一命。”刘楚樵不顾自己年老体弱，亲自为孩子检查伤情，发现患孩断脚较健康侧肢缩短了三寸，而断折处成 100° 角，明显畸形愈合。根据伤情分析，孩子搞得不好将会终身残疾。刘楚樵有些为难，做手术条件太差不允许，加之手术很危险，用力过猛容易造成医疗性损伤，即神经和血管损伤。推迟或转走良心上又过不去，在两难择选的时候，他毅然决定用手法骨折，即用手将原断骨处重新折断，再次手法复位。他凭着几十年的临床经验，非常慎重地给孩子实施了手法复位，在场的病人家属和其他人都为孩子捏了一把冷汗。经过15分钟紧张的手术，复位终于成功了。其实文献《正体类要》已说“知其体相，识其部位，一旦临症，心随手转，法从手出。”此孩经过15天治疗就能下地行走，随访无碍。一例废肢的返常不仅让人看到了刘楚樵片刻的奇妙手法，更体会到了刘楚樵那严谨的医疗态度和高尚的医德医风。

刘楚樵一生接诊无数，东南西北的伤病患者中既有富豪家的子弟，也有像萧耀南这样高位厚禄的官员，但更多的是贫苦百姓。对求诊者，刘楚樵均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并制定了先急诊、后缓诊，先远道、后邻近，随到随医、随接随去诊的规章。有一次，一支国民党部队行军路过，一位将军骑马不慎摔下将足踝部跌伤，他打听到刘楚樵医术高明，即令士兵前去寻访。当时刘楚樵正给一位髌关节脱位的农民复诊，见士兵趾高气扬地威吓，断然说：“这位伤患者疼痛难忍，待他好些后我们再去不迟。”士兵无奈只得在一旁毕恭毕敬静候。刘楚樵这种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可贵品格至今在乡里仍被传为美谈。1947年冬天的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新洲县凤凰石骨山的刘长盛父子将其65岁高龄的祖母送来，刘楚樵热情地给他祖母诊治。突然，刘长盛父子双膝跪下，泣不成声，刘楚樵对此大感不解，经仔细询问，才知他们无力支付药费。刘楚樵和颜悦色地安慰他们说：“没钱不要紧，老母的伤病我一定包给治好。再说，在这种年景，没钱治病的人多着哩。”说罢遂打发人做饭给他们吃，并送他们回家。

（三）

几十年来，刘楚樵行医的足迹踏遍鄂东大地，饱经人间沧桑。出诊的路上经常碰到饥寒交迫的人露宿荒野，他就把自己的干粮省出部分送给那些贫寒的人。对同居的乡亲，虽然自己并不宽裕，但逢年过节他都要送些东西给年老体弱和孤儿寡母的乡亲予以接济。特别是对那些无钱付药费的伤患者也是照常治疗，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对别人宽厚，对自己却是克勤克俭。

在几十年漫长的行医生涯中，刘楚樵仍坚持参加农田耕作。在行医的空余时间里，经常和村民一道修水渠、筑道路、植树造林，有时没功夫参与村民劳作，他也要挤出有限的财力支持乡亲们的家乡建设，而粗茶淡饭有时也难以保障。一双胶鞋伴他度过了几十个春秋，打下几处补丁舍不得丢弃。解放前唯一的一件长袍大褂总是带在身边，不是出诊就舍不得穿上。

解放后，省、市、地、县许多专科医院鉴于刘楚樵的医术，许以优惠条件想把他请走，被他婉言谢绝，因为他离不开生他养他的故乡，离不开和他一起朝夕相处的村民。

1966年，刘楚樵在刘集卫生所创办了骨伤科。为发展祖国骨伤科技术，他打破了“家技不传外人”的传统观念，主动把自己掌握的医疗技术和临床经验传授给外姓学徒。他虽然着墨不多，但别具一格的治伤手法和简便易行的杉树夹板使徒弟们大开眼界。他经常嘱咐学徒，要学好正骨技术，就要敢于探索，大胆实践，生搬硬套是没有出息和提高的，只有灵活运用才能发扬光大。

1972年8月，刘楚樵去世后，其三子刘迪臣为第七代传人，刘望林、刘艳林、缪金怀均为第八代传人。现在，自刘氏治伤一脉相承的弟子有20多人，其中80%以上达到医师级水平，成为县、乡、镇两乡医院治疗骨伤方面的骨干。

1986年，为使刘楚樵的医疗技术发扬光大，在新洲县政府指导下，县卫生院组织以刘楚樵后代为主体的骨伤科方面的医师成立了新洲县骨伤专科医院。

（王腊波：武汉市新洲区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调研员。本文根据刘迪臣及刘氏家族提供的资料整理而成）

沈云陔先生艺术传承往事

◇ 易 俗

原文化部部长王蒙说过：由于有所共鸣与传承，人类才不至于过分地迷失和绕圈子走老路；由于有所区别，人类才会有发展。被誉为“楚剧梅兰芳”的沈云陔先生在传承方面是卓有成就的。之所以如此，盖因他除了是响当当的楚剧表演艺术家、社会活动家外，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楚剧艺术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沈云陔曾任武汉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武汉市楚剧团团长、湖北省楚剧团顾问，他致力于兴办戏校，培养人才，改革楚剧。沈老一生思贤若渴，爱才如命，一贯摒弃旧戏班的门户之见，不遗余力地提携青年人，因此桃李满天下。据不完全统计，其主要成名弟子有：冯雅南、汪玲陔、张漪、肖毅勤、吴昭娣、张一平等。甚至大名鼎鼎的关啸彬，在1946年将其挑班的建艺楚剧团与沈云陔的问艺楚剧宣传二队合并，也拜

沈云陔为师了。其实不止如此。我为写《楚剧的女儿——张巧珍传》，历时十年，在采访逾百人后，蓦然史海拾珠——发现作为沈老的弟子张巧珍非但不可遗漏，而且还应该名列前茅呢！

“矮子成了长子”

1964年，武汉市楚剧团为参加湖北省文化局举办的第五届现代戏会演，赶排由李蕤编剧、易佑庄谱曲的大型现代戏《霜降前后》一剧。对于女主角的人选，团务会上演出了一场“戏外戏”——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小张个子是矮了点，但会唱，完全胜任。”

“××唱是差点，但会做戏，形象又好，绝对可以。”

“让小张上吧！”

“让××上吧！”

……

双方争论激烈，良久无果。

突然鸦雀无声，大家都望着市楚剧团团长沈云陔先生。

沈云陔团长对大家嘴里的“小张”了如指掌，她就是张巧珍，19岁，养父是三轮车工人，毕业于市戏校，政治、思想都不错，是团员，还当过学生会干部，一直是党组织往又红又专方面培养的好苗子。过去沈云陔兼任市戏校副校长时，曾把自己的拿手戏《九件衣》教过她，早就看中了这个好苗子，现在应该继续“施肥”。于是，他望着该剧导演熊剑啸和角儿高少楼说：“张巧珍唱得有味，一开口就吸得住人，你们这个戏唱腔多，让她去试哈。这个伢日后会有前途的，俄地屋里（黄陂方言：即我们）造孽，对这样的青年要多扶一扶……”

其实，对此观点熊剑啸导演早有共识。著名演员肖毅勤曾提过一件往事：1963年，剧团的大型现代戏《李双双》演出打响后，为让张巧珍去电台录《李双双·孙家庄变了样》的唱段，熊导曾找吴昭娣、尹秋来和肖毅勤“打招呼”。他幽默地说：“我们楚剧没有什么人，你们三个姨妈不是张巧珍的老师也是老师，对她要抬一抬哟。”

但是，此时熊导听了沈云陔团长的意见后颇感棘手。他深知一个戏演出成败，无论编剧、导演多么高明，舞台上则是演员决定一切。大多数主要演员对自己喜爱的角色也绝不相让，有时很难区分谁对谁错。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产生误解和不必要的矛盾。熊导只得使了个两全其美的妙招——AB制，一个角色由两人上，公平竞争，优胜劣汰。

张巧珍自进团后，排戏常摆在老师们的后面，这回分配当B角，也没怎么在意。但令她高兴的是，A角演员对她进行了热情帮助，而德高望重的名演员高少楼更叫她感动。论年纪，高少楼当她父亲绰绰有余，却放下身段主动找她斗戏，以剧中丈夫（喜旺）的角色，对张巧珍耐心启发，从而使她打消杂念，以至大方、自然地进入角色状态。在老师们的大力提携和她自己的努力下，后进慢慢赶上了先进。不久，熊导在排演过程中不知不觉把B角当作了A角，由张巧珍主演的《霜降前后》在楚风剧场公演后大获好评，从而奠定了她在武汉市楚剧团不可或缺的地位。有人开玩笑地说：“这一下矮子倒成了长子了。”

当时市戏校乐队的伴奏员程炳均，见证了这个事情的全过程，他说了一句颇形象又带归纳性的话：“沈老的意思就是：我给你一个打炮戏，让你一炮冲天。”

“保一舍一”

俗话说：十八岁的姑娘一朵花。但张巧珍与团内别的姑娘比的话，还算不上美女，除了有点温婉、亲切的气质外，没什么惊人之处。但她的嗓子好，声音似一朵特别香的花——她平时待人那种甜美圆润、温情脉脉的语气，从内至外散发出一种特别柔和的气场，以致于引起一些误会。省楚剧团工会主席罗顺英曾又爱又怨地评价张巧珍：“她绝不是那种轻浮的人，但是太温柔，跟人打个招呼，蛮简单的一句‘你好吵’，常常迷倒一大片，害死人。唉！”

有人曾透露一件趣事：

有一回，武汉市艺校楚剧科学生打擂比赛演出《磨房产子》，沈云陔团长前来

检查观看。在这出对子戏（即夫妻戏）中，张巧珍和一个男生分别扮演夫妻，舞台上二人配合默契，感人至深。观者反映：小小年纪，把夫妻戏演得像真的一个样。沈老看了十分喜悦，在给予充分肯定后，向科主任罗卓松了解他俩的个人情况，问是否在谈恋爱？

罗卓松笑了笑回答：据目前反映来分析的话，好像没谈，但是，也不排除两个伢有那么个意思……

沈云陔先生一生既爱才如命，又视楚剧如生命。他听了此话，思虑再三后，果断执行市艺校关于“学生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的规定，作出“保一舍一”的决定，将两人的工作分头作了调动，以防微杜渐。

出山

“文革”中，张巧珍曾一度被演员队除名，去当了“教书匠”。

1971年，省楚剧团易名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第五队（简称“省宣五队”），当权者为工宣队领导（国棉五厂工人陈帮树为指挥长）。他们认为张巧珍个子矮，当演员前途不大，于是根据她在“文革”中被人揭发批判为“走资派的红人”“沈家二儿媳”等罪名，将她“请”出了舞台，让她去做一些诸如招生、教戏、抄写材料之类的杂活。

1972年，运动形势有些缓和，沈云陔先生这时也从“牛棚”获得“解放”，但仍然“挂着”，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厨房洗碗（劳动改造）。但沈老一颗关注楚剧艺术的心却时刻没有安闲，但凡遇到有说话的机会，他都不顾重重阻力和风险，为张巧珍的“归队”奔走呼喊。他的努力终于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把张巧珍从学员培训班“请出山来”。

从此，张巧珍获得重返舞台的机会，于是奋袂而起，连迈三大步。

第一步：排演革命现代小戏《秋红》（武戏）。在砍身段、武功训练上卓有成效。

第二步：排演革命现代小戏《一斤二两半》。文化部审查《追报表》的领导看了此戏后，评价她“表演朴实”。

第三步：去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楚剧电影《追报表》。

这是张巧珍“出山”的三部曲，其光景恰如那句歇后语说的，“矮子上楼——步步高”。

为此，张巧珍曾对我讲到她对沈老的不尽感激之情：“沈团长是坐在牢里叹罪人，他自身难保，却挽救了我的艺术生命。他是楚剧的代表，所以我总说楚剧是我的母亲哟。”

交班

1978年11月，楚剧一代宗师沈云陔先生日益恶化的病情，牵动着广大楚剧人的心。

此时，作为湖北省楚剧团“台柱”之一的张巧珍，听闻沈老住院的消息后，十分担忧。她不忘师恩，立即停止排演工作，携几位主要演员前往武汉同济医院看望。因此，才有了她与沈老平生最后的一次交集。

这次见面不仅仅是一种人际交往，也绝不止是师生情谊的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老少两代楚剧人之间的一种交接。

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沈老知道张巧珍来了十分喜悦，绽开了笑容，发出久违的笑声。他不顾自己正在打吊针，唤人扶着自己坐了起来。张巧珍挪动沉重的步子缓缓靠近，久久伫立床头，双目深情地望着这位曾经在楚剧舞台上叱咤风云、大放光芒的人物。今日

的沈老瘦骨嶙峋，形容枯槁。联想到自己受到的种种关怀与提携，张巧珍鼻子一酸，差点儿哭出声来。但她立刻控制情绪，强颜欢笑，俯身向前仔细询问病情。

几十年如一日一心扑在楚剧事业上的沈老，对家事、儿女事从不顾及，此时对自己的病痛也闭口不言。简单寒暄几句后，话题不知不觉中转换，他反倒问起张巧珍艺术上的事。张巧珍只得把排演《蝴蝶杯·藏舟》中遇到的难题如实告知，说老师中对胡凤莲谈恋爱的表演有严重分歧，一派说要笑，一派说不能笑，让她左右为难。沈老望了望大家，然后目光停在张巧珍面上。他并不急于正面回答，而是绕了一个圈子。

“一个好演员哪，不管是演什么人物，都不能脱离剧情，要讲戏理。表演和唱腔都要让人感到在情理之中，有韵味又有回味。平时要多积累，多琢磨，只有弄通情和理之间的关系，那就开了窍，演的人物就不呆板，有灵气，才能打动人咩。”

大家看到沈老面无血色、说话吃力的样子，隐约感到这也许是最后一课，都认真倾听，不时点头，有的生怕遗漏一个字，赶紧拿出本子做笔记。接下来，沈老继续娓娓而谈，以自身经历回忆起美好的往事：

“也不能怪你巧珍，就是与我一起的百川哥、陶古鹏、余文君、江秋屏，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也有得这个福气。我早年（即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有幸认识了一批大艺术家和领导，得到他们的指点，比如：董老、陈潭秋、李之龙、刘艺舟；特别是后来抗战时期周副主席介绍我又认识了郭老、田汉、



沈云陔与楚剧《三世仇》剧组在一起。张巧珍扮演虎儿妈（右五）

沈雁冰（茅盾），还有老舍、洪深等学问家。正是这些楚剧的大恩人、良师益友，告诉我很多革命和做人的道理，艺术上还给我出点子。比如《巧断绣鞋案》，当时我在汉口演了几十场，后来沈钧儒和史良帮我分析案情，再谈戏理，我改了一遍又一遍，直至他们通过。身边有这多高人帮你，如果还不进步，那就是个猪。

我经常为先生们提出的问题睡不着，就爬起来想，实在想不出办法，就静下心来看书，看着看着就扒在书桌上睡了，做梦也还在戏中。你们，书中自有黄金屋咩！”

接着，他喘息未定，愣是要求护士将吊针取下，猛然挣扎着站起身来为张巧珍作示范。这时，尽管病房的门关上了，还是惊动了其他病房，许多病友和护士纷纷围了进来。沈老怕影响大家休息，就叫儿子沈建武扶他到楼下花园去说戏。沈建武想起医嘱，赶忙阻止。张巧珍也带哭音央求说“不”，并连说已经学会了。沈老不放心，愣逼着张巧珍在病房按他说的走小圆场；他又说她的

眼神不对，要练眼神。于是这才回到前话的正题，从胡凤莲的身份和规定情境，谈到人物表演分寸的把握。

“《藏舟》的戏你问该不该笑，关键是首先要弄清规定情境是么事。一个朴实的渔家女，父亲尸骨未寒，如果只看到这点当然不能笑，但是面前这位公子已经为她报了父仇，闯了塌天大祸，如何对待这位大恩人的态度才是真正的规定情境。我们把这个‘理’弄明白了，那个‘情’就好办，你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老师一番话，学生如饮醍醐，茅塞顿开。

主治医生闻讯急忙赶来，对大家说，老人家要静养，情绪不能激动；你们如果真的爱护自己的老师，最好不提什么问题。委婉地下了逐客令。

沈老对医生恳求道：“医生，莫呐！‘文革’耽误了十年，现在又一病不起，我心里急啊！这些伢们都是楚剧的后人，我这点玩意不能带进棺材，不然就对不起那多关心、帮助过我们的先生们。为了楚剧后继有人，就是豁出我的这条老命也值得。能为他们留些东西，哪怕累死，都心甘情愿咩！”

情真意切的一番话，让在场所有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张巧珍等人依依不舍地告别而去了。

沈老还意犹未尽地自语：“唉！巧珍这伢唱腔有得话说，可惜文化底子薄了点，要演活一个人物，要挑大梁，让楚剧走出湖北，那是要下大功夫的咩。”

当年陪护沈老的沈建武至今记忆犹新：“老爷子对易佑庄、余少君、姜翠兰等老师曾多次说过，要他们多带一带巧珍，还吩咐建国在文化和艺术修养上多帮助她。”

后来，沈老在昏迷中醒来时，又对前来探望的湖北省楚剧团领导张其祥等人叮

嘱：“巧珍出身贫寒，家庭不顺，是个苦命人。她的嗓音不错，唱腔蛮有特点，观众十分喜爱。俄地楚剧是个穷家，这样的人才要多培养爱护咩……”

1978年11月20日，即与张巧珍谈话数天后，著名楚剧艺术大师、楚剧奠基人之一、“沈派”艺术的开创者沈云陔先生驾鹤西去了。

综观沈老一生，其对张巧珍的培育和关爱虽因“文革”动乱而有所影响，但其精神是贯穿始终的。尤其是在生命尽头的最后一课，披肝沥胆，用意深长，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恰如张巧珍主演的楚剧《江姐》所颂：春蚕到死丝不断，留赠他人御风寒。也许正是因为沈云陔这些老一辈艺术家甘当伯乐，孜孜不倦地精心培育英才，才使楚剧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易俗：原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编剧。沈云陔之子沈建武先生对本文写作无私提供资料，作者在此表示感谢！）